

党政干部参考

（原名《党政干部文摘》）



主管 中共中央党校
主办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协办单位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总编辑 / 社长 陈高桐
常务副总编辑 周 慧
副总编辑 张 莹
副社长 武志国
编辑部主任 史小平
本期责编 周 慧
封面设计 关小雷
设计制作 崔金杰
责任校对 苏彰秦
封面题字 权希军

编辑出版 《党政干部参考》杂志社
杂志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中共中央党校综合楼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2805451 (兼传真)
E-mail dzgbwz@sina.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11-5922/C
国内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2-49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0301号
印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价 6.00元

要论

3 胡锦涛：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学习与研究

5 学习新时期科学党建思想之我见 / 韩旭

7 根子在文化不足 / 许嘉璐

高层言论

8 张高丽：跑官要官的人得不到人民群众信任

9 俞正声：让世博成为城市新的骄傲

10 李荣融：央企不要做雷曼

10 苏 荣：“灌水”“拍砖”之处，民生关注之所

11 赵洪祝：转型升级 制胜未来

热点聚焦

1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改革
与创新 / 艾洪德

14 中美竞争，看谁先变增长方式 / 王缉思

15 “十二五”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 匡贤明 何冬妮

17 吴敬琏：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刻不容缓

反腐倡廉

18 制度反腐的核心是什么 / 辛宇

20 公共财政也有廉政职能 / 傅光明

21 警惕情趣腐败 / 张书林

经济纵横

22 去年 GDP 增 8.7% 中国经济 V 形反转

24 相关链接：2009 年全年核心数据

24 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宜稳不宜退

26 城市化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20 年 / 卢中原

农业·农村·农民

- 27 陈锡文解读中央农村发展新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
- 28 搞城镇化应多鉴他山石 / 王龙云
- 29 只有城乡统筹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 彭真怀

共同关注

- 31 新媒体时代：处置突发事件的“黄金4小时”法则
- 32 相关链接：几种主要的“黄金4小时媒体”
- 33 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成执政最大挑战
- 34 安全生产是否出现“拐点”

学员论坛

- 35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
/ 叶小文

百家言

- 37 带着学习的激情解读世界 / 孙家正
- 38 把握中国的国际定位 / 刘建飞
- 39 县委书记要敢于为老百姓担当 / 刘森
- 40 不要看空中国 / 汤马斯·弗里德曼
- 41 撤驻京办，不如从根本上规范权力运行
/ 未多
- 42 对盐业改革的三点隐忧 / 雷泓霁

环球瞭望

- 43 海地：多难未兴邦 / 魏红霞

最新书摘

- 45 我是怎样研究政党的 / 王长江

文史苑

- 47 酷爱读书的刘伯承 / 史全伟

- 48 世博会曾震荡晚清王朝 / 张伟

健康之友

- 50 中庸：养生的至高境界
- 51 警惕国人再次沦为“东亚病夫”
/ 徐光兴 黄建始
- 52 国人口味全球最重

信息窗

- 54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 54 发改委报告勾勒四大产业发展思路
- 55 卫生部：出台改进公立医院服务意见
- 56 原县处级以上干部减刑一律开庭审理
- 56 相关链接：九类犯罪须重判

数据库

- 封三 中国经济成功“保八”
- 封三 世界银行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

撷英咀华

- 封二 吕梁赋 / 董洪运
- 封底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如有破损、漏页、模糊、影响阅读的，请与本刊编辑部申继红联系调换

特别提醒：本刊登载的署有作者姓名的文章或文摘均有报酬，请作者与本刊编辑部联系或直接与北京市版权局稿酬收转中心联系。

地址：北京朝阳区和平街11区甲24号

邮编：100013

电话：(010) 84251823

胡锦涛：

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2010 年 2 月 3 日上午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强调，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使我国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主持。

胡锦涛强调，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们作出了 3 个重要判断，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 2009 年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我们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立即果断实施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态势。二是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拓展我国发展的外部空间。三是必须把保持我国经济当前平稳较快发展和为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政策措施不仅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且要努力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为我国经济

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我们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在扩大内需中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营造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全党全国共同努力下，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经济实现总体回升向好。

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初步的，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我们要继续努力，巩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胡锦涛强调，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

胡锦涛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

然要求。我们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实现我们党对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胡锦涛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胡锦涛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他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出了8点意见。

第一，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按照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调整城乡结构，加快推进城镇化，加快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既着眼于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为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谋求经济长远发展主动权、形成长期竞争优势，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第四，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大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

第五，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污染防治，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加快实施生态工程，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六，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针对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加快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发展面向民生的公益性社会服务，更好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七，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加快开拓文化市场。

第八，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加快调整进口贸易结构，加快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胡锦涛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推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摘自2010年2月4日〈人民网〉）

学习新时期科学党建思想之我见

韩 旭

1. 增强党的建设的自觉性、开放性和主动性

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其先进性固然要体现在许多方面。但是，如果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不能拥有一大批善于学习、知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视野开阔、目光深邃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具有一定级别的中高层领导干部；不能拥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卓越思想家、理论家和各方面的专家，我们党的先进性就会受到很大制约，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就会受到很大制约。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缺乏理论思维，就会是肤浅的、没有前途的。如果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担负着领导和推动实际工作前进的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理论，且本身没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而理论水平很高的学院和研究机构里的专家学者又不处在实际工作一线、不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一些地区、单位决策的盲目性和不科学的发展难道不是这样造成的吗？由此看来，我们必须坚决克服把理论和实干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偏见。

在有些人看来，好像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就一定不会实干，或者反过来说实干能力强的人不需要较高的理论水平。这种看法肯定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干部看起来整天忙忙碌碌的，对工作也有热情，好像很能干、很务实，但实际成效并不佳，一年下来不知忙了些什么。深究下来，这些同志其实缺乏宏观思维 and 创新能力，讲来讲去就是自己熟悉的那点东西，而一旦要具体抓落实的时候，他又大而化之，结果就会耽误党的事业。这就是不注重学习、不重视理论带来的恶

果。相反，有一些工作很卓越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很高、眼界非常开阔、宏观战略思维 and 创新能力都很强，而在抓落实的时候，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又非常具体、非常深入、非常务实，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理论与实干、宏观与微观、长远与当前的有机统一，确实具备了科学发展观对党员领导干部所要求的必备素质。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提出这样的任务，其现实意义何在呢？这里，至少有下列因素，我们要认识到：第一，现在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各种现实的挑战和考验十分严峻，各种思想意识问题、各种思想理论的交锋和较量也十分激烈。第二，现在我们所从事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世界上属于独有和独创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照套，完全要靠广大党员在实践中探索创造、总结概括、升华提炼。如果没有科学理论武装，要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是不可能的。第三，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是世界正义进步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追求是人类前进的发展方向。要推动正义进步的事业，需要先进理论武装；要实现国家、民族、世界先进的未来发展目标，更需要先进理论的武装。

当前和今后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的建设，就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党的建设中存在的自发性、封闭性、被动性问题，增强党的建设的自觉性、开放性、主动性。应该说，党的建设在实践中的发展是十分迅猛的，有许多新的探索创造，无论是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等，各个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是越到基层，就越是多样。这是值得肯定和欣慰的。但是，党的建设决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个

别的经验、局部的做法、自发的阶段上。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学说，从来不是在实践中自发产生的，而是由党内的优秀分子、思想家、理论家、领袖们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自然的等各种知识之后所创造和形成的；然后再用来指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实践。

党的建设的科学思想和理论包括科学的制度，并不会自动地、自发地从党的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出来，而必须由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专门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们，努力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把握实际、把握规律的能力，在花费极大的心血、付出巨大的对实践的总结提炼进行创造性思维劳动之后才能取得。同样，党的建设的科学理论和制度一旦形成，也并不会自动地、自发地运用到实践中去，也需要花费极大的心血、付出巨大的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创造性思维劳动之后才能实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抓落实也要动脑筋、想办法。在这里，创造性的思维劳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联结党建理论与党建实践之“桥”，没有它，党的建设的科学理论不但无法形成，而且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毋庸讳言，对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寻找差距，当前党的建设中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创造性的思维劳动。一方面，我们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在实践中业已存在的许许多多具体的做法、许许多多具体的创造进行总结提炼明显不够。面对丰富的实践基础和素材，我们的作为不够大。许多事情还停留在比较粗浅的阶段，有关党的建设各种经验材料、报告、会议、讲稿、文件、书刊等等存在大量的雷同和重复的现象。许多单位，虽然对实践中的各种具体做法和经验也在总结，但这种总结基本上是属于就事论事的，至多是进行了一、二、三、四、五条这样简单的概括以及在原有素材的基础上稍稍前进了那么一两步而已，还没有揭示出具体做法经验的实质和背后蕴藏的深刻道理，远没有上升到和形成影响大、深刻而厚重甚至是光芒四射的党建科学理论和制度，这是十分遗憾的。因此，这就使得许多好的具体做法经验只停留在“点”上而未能对面上的工作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主要

是由于我们对具体的做法经验了解不够，或者对经验总结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劳动不够，或者是思想理论水平不高所致。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形成的党的建设的科学理论、政策制度和明确的要求，我们在贯彻落实时又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没有完全落到实处，仅仅停留在会议文件上和部署号召上，致使党建工作中一些突出的问题依然在那里存在着，这是十分令人忧虑的。究其原因，也主要是由于我们在抓落实的过程中把理论转化成实践所进行的创造性思维劳动不够；或者说，是不愿动脑筋、不愿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导致的。

党的建设决不仅仅等同于党的自身建设，它要高于和大于自身建设，存在于、体现在党领导的全部事业上，并且最终要通过党的领导水平、党的先进性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党的建设决不仅仅是党务部门和党务工作者的事业。经济建设中有党建，政治建设中有党建，社会建设中有党建，文化建设中有党建，甚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也有党建，党的建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如果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党的建设等同于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那么就会带来以下诸方面的问题：第一，范围就会很窄，其结果就很难适应领导伟大事业的需要。第二，容易形成“纯党务”和系统内的自我循环。眼睛如果只盯着自身建设的事情，而对经济社会等其他各项事业关心和研究不够，久而久之我们的思维就会固定化，变得很封闭、视野不开阔，为党委和政府中心和大局服务的敏锐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实效性就会大打折扣。第三，容易产生除了组织部门和党务部门之外的其它行业和部门的同志，特别是从事经济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同志对党的建设关心和研究不够的问题。

2. 科学的党建思想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

我们应该明白，这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广大党务工作者和组工干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逐步形成和确立了科学的党建思想。笔者以为，这种科学的党建思想，包括党的建设系统和全局论、党的建设传承与创新论、党的建设坚定的目标和伟大的历

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不单纯是 ABC、123、 α 、 β ——

根子在文化不足

许嘉璐

30年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创造性地提出20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从那以后，实现小康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我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要逐步加大文化的分量。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小康”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内容。《礼记·礼运》篇中提到的“小康”，“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及“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功，刑（同“型”，以……为规则、模范）仁讲让，示民有常”等等，谈的全是道德、人际关系和人的心态。为什么不谈经济？因为古人早就懂得要过上平稳、和谐的生活，经济是基础，这是前提，也就不必谈了。到了今天，我们首先要解决口腹问题、穿的问题、住的问题、行的问题，即温饱问题，此后希望宽裕一些；等到生活安定、收入稳定了，人们要什么？要文化。因此，中央多次提出，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作为决策者，比

老百姓多看出了两步，因为文化建设和建大楼、修高速公路不一样，不是一朝一夕、三五年能见成效的，如果不及早思考、动手，当人民群众这种需求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措手不及。所以中央强调，文化体制要改革，要解放文化生产力。

第二，党中央提出来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和谐是人和人（包括个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科学发展则不是 ABC、123、 α 、 β 能够决定的。城乡是否统筹、如何统筹，不是技术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要和谐，一定是科学发展。不顾环境，造成二氧化碳排放过多，酸雨天天下，和谐不了；排放物有重污染，癌症、怪病频发，和谐不了。不管和谐发展还是科学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观念，人的文化素养，而不是钢铁、水泥、光伏板。物质、经济永远是基础，只是基础。

第三，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最根本的是文化。当然，要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基础，没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也不能发展。

史使命论等等。

——关于党的建设系统和全局论，主要是指我们要开阔视野、开阔眼界、开阔胸襟，以共产党人远瞻星辰、深刻洞悉历史和未来的眼光观察问题，突破把党的建设降低为自身建设的狭隘认识，自觉地把党的建设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放到全球和时代的大背景去统盘考虑，自觉地为党的中心工作和大局服务，为党的整体事业和奋斗目标服务。

——关于党的建设传承与创新论，主要是指我们要把握和遵循党的建设 and 组织工作固有的内在规律性，按规律办事，毫不动摇地坚持过去我

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所形成的体现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规律的成功经验；同时勇敢地、大无畏地根据新情况和新的实际探索创造新的做法、经验，寻找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更多更大的规律，在传承与创新变革的过程中保持党的先进性。

——关于党的建设坚定的目标和伟大的历史使命论，主要是指我们共产党人在改造和建设客观物质世界以及自身的主观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明确的追求、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远大的理想。

（作者为中组部组织局副局长级巡视员）

（摘自2010年1月28日《组织人事报》）

但是，有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也不见得就能够有序发展。历史上有过成功的例子，也有过失败的例子。成功的国家，如以色列。从公元一世纪犹太王国被灭掉，犹太人分散到欧洲各地，每到一个国家就建一个犹太社区，常受到歧视，在东欧、西欧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对犹太人的大屠杀，20世纪初还发生过一次。但是由于犹太人死死地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无论漂泊到哪里都能顽强地生存。发展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犹太人在掌握着世界的经济。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犹太民族的比例是最高的，马克思、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而一旦1948年犹太“复国”之后，在加沙地区、巴勒斯坦地区生活的100万犹太人迅速增加到400万，现在超过600万。以色列土地虽小，耕地更少，水源掌握在黎巴嫩、叙利亚的手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以色列现在是世界上一个科技的强国、经济的强国。这是成功的事例。失败的事例眼前就有。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决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监管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是无限制、无止境的贪欲。

更何况，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创新，靠的也是文化：超越前人的胆略、层出不穷的想象力、不怕失败的勇气，都不是技术而是人文修养。一个地区或国家在达到小康以后，要让它持续发展下去，文化这位主将就需要登场了。当然，文化建设是要花钱的，但这个钱应该花，值得花。它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建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有些地方党委、政府的同志张口闭口都是项目、GDP、财政收入，这些都是对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中心，没这个一切都谈不到。但是，你哪怕捎带谈谈文化建设也可以。可惜没有。有的人甚至说这是中央的事。这说明文化问题没进入到常委会、没进入到书记的大脑里。要知道，和谐也好，可持续发展也好，人民群众和、乐的心态也好，在经济水平提高以后，是不会自动到来的，还需要我们的决策者通过具体的措施慢慢引导，提供条件，营造舆论。

（作者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摘自2010年2月1日《北京日报》）

张高丽：

跑官要官的人 得不到人民群众信任

我们坚决杜绝跑官要官。为老百姓的事是干出来的。跑官要官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有本事的，真有本事，就不会跑官要官。跑官要官的人，得不到人民群众的信任，也不可能为老百姓办实事。在任用干部的过程中，哪个打招呼，进行任何暗示，都不要理睬，对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过程也是如此。我们要努力形成一整套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坚决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团团伙伙，拉拉扯扯，这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跑官要官一点希望也没有。

我们要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既要坚决反对和严厉查处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也要关心德才兼备、干事创业的干部，保护那些忠于党和人民，敢抓敢管，善抓善管，敢于碰硬，为民办事的干部。现在做好一件事，实在非常不容易啊，对德才兼备、干事创业、开拓创新的干部，我们一定要关心、爱护和保护，这样才有人做工作，党的事业才有希望。要严肃追究诬告者，坚决打击歪风邪气。德才兼备、干事创业的干部，比那些遇事绕道走、当老好人、做太平官、不干事、干不成事的干部，不知要强多少倍。当前天津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特别强调，需要一批又一批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开拓创新的干部，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我们的干部不管在哪个岗位，只是分工不同，都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一方

热土的发展，为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应尽职尽责。我们一定要始终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用来造福百姓，决不能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本和工具。我们的一生最有价值的，是为老百姓做了什么事，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而不在个人名利地位的高低。人民群众说你好，才是真正的好。

我们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以优良的作风和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决不能搞任何形象工程，搞了，对社会和老百姓没有一点好处，还会留下负担后患。我们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整治市容环境，进行植树绿化，是让老百姓长期受益的事；我们把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以及文化中心建设等一批重点规划向全市人民公示，广泛征求意见，是为了子孙后代造福，都不是为了形象工程。我们时刻要有忧患意识，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我们来自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也对不起人民。

（摘自 2010 年 2 月 4 日《人民日报》）

俞正声：

让世博成为 城市新的骄傲

今年是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年。全力以赴办好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是全市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也是上海的光荣、机遇和挑战。

2002 年 12 月，我们以“中国若有一份幸运，世界将添一片异彩”的庄严承诺，赢得了 2010 年

世博会的举办权。为了实现这一承诺，8 年来，我们乘“世”而上，启动一批惠及民生的市政工程，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顺“世”而为，各项布展工作有序推进；我们因“世”利导，以“平安”、“快乐”为重点，引导广大市民参与世博、奉献世博、共享世博。

8 年来，我们深切感受到广大市民对世博的热情和奉献，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中央各部门、各兄弟省区市对上海的支持和帮助，感受到国际社会及友人对我们的祝福和期盼。

我们要用平安和谐铸就“成功”。184 天将迎接 7000 多万人次的参观游览，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壮观盛会。全力做好世博安保工作，需要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形成人人参与“平安世博”工作的强大合力。

我们要用创意活力打造“精彩”。不仅世博的展品、布展、活动、宣传报道等方面要有创意，而且城市运行和保障，以及园区和场馆的管理也要创新，让城市的智慧无所不在。

我们要用快乐温馨实现“难忘”。要使整个办博过程成为便民、利民的过程，让参与奉献与共享快乐并存，让全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关爱与亲情，让世博的运行管理更为人性，切实做到让参观者、参展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切身感受到友好的情谊。

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面对我们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面对中央领导和 13 亿中国人民的殷切期盼，面对世界关注的目光，面对全市干部群众 8 年来为筹办工作所付出的心血，再大的困难，我们要努力克服，再大的艰辛，我们决不退缩！我们必须以信守承诺、说到做到的行动，不辱使命、为国争光的决心，团结协作、乐于奉献的精神，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作风，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意志，谦和坦诚、海纳百川的气质，同舟共济迎挑战，全力以赴办世博，让世博成为城市新的骄傲！

（摘自 2010 年 2 月 1 日《凤凰网》）

李荣融：

央企不要做雷曼

2007年底，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我们就提出要捂紧“钱袋子”。2008年4月召开经济形势分析视频会议时，我们要求中央企业要储备足够使用两年的钱，保证即使开不了工也能发出工资。因为面对危机，谁能熬到最后，他一定是胜利者。我们之所以这样要求中央企业，是因为我们有过教训。之前我们有一个企业运行得还可以，但负债率高达87%。结果，一有风吹草动，银行听说这个企业有点问题，就把企业的资金紧缩了，结果这个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只能接受重组。所以，现金流一定不能断，否则就必死无疑。

雷曼兄弟公司高层在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是唯一不被拯救的？的确，如果当时有人救雷曼一把的话，也许它不至于倒闭。但从企业的眼光来看，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呢？作为企业自身，特别是大企业，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因为造成的影响绝不仅仅是针对这一家企业那么简单。比如东风汽车，它在湖北的零部件配套企业就有345万人就业，中国铁建公司职工有25万人，但它雇用的农民工约有160万人。假如这些企业垮台，就会有数百万工人下岗。所以，在前景不太明朗的时候，没有比捂紧“钱袋子”更为紧迫的。

经历国际金融危机这种大变革，是对我们企业基本功的大检阅，企业平时积累下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作用了。

首先是强化风险管理。2006年6月我们就启动了全面风险管理的指引，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效果在这次危机中显现出来了。中央企业至今资金链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更没有一个企业倒闭。

其次是要抓成本。说实在的，竞争的背后就是成本的竞争。别看企业老总坐在前台谈判，背后靠的是企业的成本，成本降得下来就有竞争力，就能谈得赢；降不下来，很难赢。所以国资委成立后，我们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考核有4项指标，其中一项就是成本。在这次危机当中，成效也显现了出来。

第三是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如我们一个轻工机械的企业亏损了，工资都发不出来，而一个建材企业有市场却没有制造能力。现在把轻工企业的制造能力和建材企业的市场份额配置在一起，两家企业都活了。所以，要提高国有资产配置效率，必须重组，必须调整。

最后是加强研发。企业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必须有技术储备。当然，加强研发，首要的是产品要有市场，企业要盈利。总之，中央企业不是小企业，大企业是一艘航空母舰，不能沉，沉下去是起不来的。

（摘自2010年1月29日〈网易〉）

苏荣：

“灌水”“拍砖”之处， 民生关注之所

网络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无处不在，时刻影响人类生活。“网络通四海、网络达网民”，一个信息透明、交流畅通，直接对话、平等沟通的网上社会业已形成。网络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载体、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凝聚民智的重要方式。网络问政是了解民情、排解民忧的直通车，是改进工作、创新服务的助推器。

网络为广大网民提供丰富、健康的资讯服务，为党委、政府与网民之间架起了一座上情下达、下

情上达的桥梁，为网民之间搭建了一个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平台。从网络中，网民们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智慧，增添了力量，增进了友谊，获得了乐趣。

我也是一个“网虫”。在线浏览、“网上冲浪”已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网络，与广大网友早已联接在一起，融为一体。“网”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网民虽不是个个才华横溢，却人人个性鲜明。网上“灌水”之处、“拍砖”之语，多是民生关注之所。交流与碰撞的火花里，产生了许许多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建议，很多都进入了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层面。去年是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江西经济能取得逆势上扬、进位赶超的良好成绩，广大网民功不可没。可以说，江西崛起的每一个铿锵步伐里，都饱含着大家的浓烈期待和炽热情怀，凝聚着大家的智慧和心血。借此机会，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国家中部崛起规划开始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全面启动，江西全省上下心齐气顺，正处于一个激情燃烧、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话题更加丰富，广大网友写博客、织“围脖”的舞台将更为广阔。相约虎年，我们约定，继续轻点鼠标、敲击键盘，合力奏响汇聚万千民意的江西崛起最强音。

（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给全省人民网上拜年）

（摘自2010年2月12日《新华网》）

赵洪祝：

转型升级 制胜未来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经济运行中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素长期累积下的一次总爆发。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模式难以为继，“以资源换增长”的粗放发展模式同样无法持续。当前，

浙江正处于“爬坡越坎”的关键阶段，只有转型升级这一条路，才是浙江制胜未来的根本出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按照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要立足于原有的基础，按照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兼顾当前和长远，优化产业规划，因地制宜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要兼顾继承和创新，不断开拓新局面，立足于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任务，认真总结以往的好做法好经验，坚持和提升正确的工作思路，同时着眼于“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不断拓宽视野、解放思想，推进思路创新、方法创新、政策创新。要兼顾速度和效益，强化政策支持，加快形成速度与质量有机统一的、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努力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要兼顾内生与外延，完善支撑体系，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和条件，集聚人才、技术、资金和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推进转型升级必须寻求具有带动效应的突破口，大力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大平台建设上，要把发展空间与内容作为统一体，整合资源，集约发展。大产业建设上，加工制造业要向高端推进，生产、生活性的服务业要全方位推进，农业产业要向高效生态推进。大项目建设上，要抓住扩大内需的机遇，发挥投资带动作用。大企业建设上，要在继续重视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其做优做精的同时，继续采取多种途径，培育骨干龙头企业，促进有条件上的企业不断成长壮大，着力推进大企业同产业集群相结合，这样才会有竞争力，在市场上有话语权。同时，要按照新型城市化的思路推进城市功能的完善和提升，使之成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要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摘自2010年2月5日《搜狐网》）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

艾洪德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在何处

首先是发展观念的束缚。发展实践需要发展观念进行指导，什么样的发展观决定了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与不合理的发展观念密切相关。观念问题集中表现为我们把发展的认识更多集中在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为了实现快速增长，不惜消耗资源、损害环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定的追赶型、跨越式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加速发展”战略，都是以经济增长速度的“快”为核心的，在追求“快”的同时必然忽视或忽略质量的提高和效益的改善。鉴于此，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把“好”字放在“快”的前面，突出了“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发展观念的根本改变。

其次是发展阶段的制约。理论与实践证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不同。当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靠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尚不充分，主要是依靠投入较多的劳动和初级资源；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靠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对缩小，经济的增长将逐步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化步伐，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我国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人均收入不高，工业化进程没有完成，城市化进程加速。在这

种情况下，依靠较多劳动和初级资源投入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还有一定空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改变。

再者是体制机制的约束。对经济发展方式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变量是体制因素。在传统的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之中，非企业化的软预算约束与高投入、非货币化的交易关系与高消耗、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与低效率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机理，内在地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特征。纵观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历史，可以明显看到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决定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但体制机制的约束仍然存在。

当前，经济中的体制机制约束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价格体系未完全形成。目前市场价格能够发挥较大作用的仅仅是产品和服务市场，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二是市场主体地位未完全独立。近年来，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主导经济发展的仍然是国有企业，由于产权的限制，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许多行政性干预，致使企业无法真正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三是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现在实行的是以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规模等经济指标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标准，导致了政府角色的

错位，铺摊子、上项目、粗放式扩张成为最佳的途径选择。四是财税激励机制有偏差。目前我国财税体制实行的是分税制，经济收入方面的考虑迫使各级政府追求产值的增长，要去发展那些产值大、税收多的重化工业，或者是低水平的加工工业产业，而不是按照经济效益的标准去规划、去发展产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困难，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其深刻的体制机制性根源。在制度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路径依赖，指的是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也就是说，一旦人们作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而言，体制机制的路径依赖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些体制机制问题是长时期内存在的，其运行惯性十分强大，只有施加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才能使之摆脱原有路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核心是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从制度安排入手，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为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是一定市场形态下价格、供求、竞争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由此推动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机能。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机制改革，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

标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今后，要进一步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改革，让价格体系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进行资源配置。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介入，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

二是完善科技自主创新机制。在能源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和低成本弱化的情况下，只有把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才是有后劲的、可持续的。为此，要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结构布局，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以科技人员为主力军、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三是创新政府官员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官员的考核应围绕政府职能履行状况进行，除了从官员自身“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考核之外，还应该将完成任务所消耗的成本费用纳入考核范围，同时还要考虑在任期间生态环境、民众生活质量等外部因素。换句话说，要对政绩进行全方位综合考核，而不仅仅是GDP增长和形象工程。

四是建立起低碳经济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全球气候变化已然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的挑战。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世界进入了低碳经济时代。低碳经济是崭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动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中国需要抓住时代发展机遇，及时建立起低碳经济的约束与激励机制。这包括资源循环利用机制、节能降耗激励机制、碳交易市场机制，等等。

（摘自2010年2月8日《金融时报》）

中美竞争，看谁先变增长方式

王缉思

中美两国面临的国内大局都是要争取“创新优势”

外交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是国际关系的铁律。对于国际问题研究者来说，观察、分析、预测、进言的出发点，首先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从今年1月初到现在，中美关系中接踵而来的纷争冲击着中国人的眼球：美国对台军售、谷歌威胁退出中国市场、双边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问题、奥巴马计划会见达赖，等等。最激起中国人义愤的，是1月底宣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案。于是，“中美关系跌到谷底”、“中美要陷入新冷战”的担忧，又一次浮现于报端和网站头条。

让我们把眼光移到国内大局。2月初最大的国内新闻，当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党校参加专题研讨班，主题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胡锦涛总书记在2月3日的讲话中，“加快”这个关键词，累计用了50次，凸显中央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与紧迫感。

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中美风波频现，有什么内在联系吗？我的回答是：联系太密切了！胡锦涛在这次讲话中，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这就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特点紧紧抓住了。

奥巴马那厢，大局意识也十分明确。1月30日宣布对台军售无疑冲击了中美关系的稳定，遭到了中方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也必然会付出代价。但这绝不是奥巴马政府的工作重心之所在。就在3天前的1月27日，奥巴马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强调“将就业列为2010年头等大事”，为此要增加失业补贴、鼓励创建小企业、扩大出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推动医疗改革等等。奥巴马还以“中国没有等待，

进行经济改革”和“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二等国家”来激励他的国内听众。虽然没有使用“加快经济转型”这样的中国式概念，奥巴马想带领美国做的头等大事，同样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争创新优势”。

中美互为对方的国际大局的一部分

中美两国面临的是同一个国际大局，而两国又互为对方国际大局的一部分。一直以来，中国是美国产业和投资转移的最大承接地；美国（就单个国家来说）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最大市场。对美国来说，中国是应对全球安全热点问题和气候变化挑战中最需要寻求合作的国家；对中国来说，美国是对外关系格局中的重心所在。过于依赖虚拟化经济、消费品和能源进口的美国，要重建“再工业化”的实体经济，扩大以技术创新引领的出口；中国不能再靠巨额投资和依赖出口拉动，必须改变以高投入、高消耗、牺牲资源和环境来发展经济的模式，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推动自主创新产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两国的经济转型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如果两国不各自加快国内调整步伐，在国际上不相互合作，各自的经济复苏、社会稳定都不可持续，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新能源等全球大议题也不会取得重要进展。美国经济史学者弗格森所谓“中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和战略家所谓“两大国集团”，指的主要就是这样一种密切互动的结构。

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改革，不仅会产生合作动力，也会带来新的摩擦和带有长远性质的竞争。比如，美国就业艰难，要减少进口依赖，增加储蓄，就会有更多的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出台，压人民币升值；推动出口，保护海外企业的利益，又会同中国提升自主创新产业抢夺制高点。这就是谷歌事件、“网络战”以及美国在华企业联名发出抱怨的重要背景。中美在气候变化和开发清洁能源问

“十二五”是我国

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匡贤明 何冬妮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于2009年12月组织了“十二五”改革专家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54份。其中,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专家占23%;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占67%;其他方面的专家(包括企业界人士)占10%。

调查认为,“十一五”改革取得较大进展,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改革不尽人意

1.“十一五”在解决民生问题相关改革上取得较大成绩。从总体看,79.10%的专家认为“十一五”改革取得一定进展。在“十一五”改革亮点上,69.21%的专家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相关

改革是最大的亮点。在“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六大重点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获得的评价最高,占50.85%。在推进改革开放的10项主要任务中,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落实得相对较好,二者选项比重分别为51.69%和43.50%。

2.“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改革相对滞后。一是市场化改革进程低于预期。合计有56.49%的专家认为“十一五”的市场化改革有所进展。其中41.24%的专家认为市场化改革局部有所突破,但总体进程一般。66.10%的专家认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直接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

题上的合作与竞争,也刚刚拉开帷幕。中美关系的长远走向,越来越取决于这些关系到两国核心利益与国计民生的新议题。

“中美新冷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新议题的紧迫,并不能完全掩盖台湾、西藏、人权等损害了双边关系几十年的“活火山”的不时喷发。今年初这一轮中美风波的一个特点,是几场争论较量相互交错上升,让人目不暇接,不禁使人发问:“难道美国要回到遏制中国的老路上去吗?”

其实,要是以为中美风波中各个事件都是奥巴马政府在台前幕后导演,实在是高估了它的战略思维水平和政策协调能力。美国的内外政策大局,不允许奥巴马政府刻意寻求同中国对抗。在西方世界,一些舆论渲染中国进行了战略上的重新评估,不再韬光养晦,“唱衰美国”,“打民意牌”,也实在是看花了眼,低估了中国战略谋划的能力和政策的连续性。

具体到眼前的几个“火山喷发”,分析家往往没有注意到,由于中国政府和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

的各界人士的长期努力,由于两岸关系的重大改善,2001年美国做出的对台军售一揽子计划,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完全执行。考虑到中国的态度,美方以维护中美关系的良好气氛为由,拒绝了去年10月达赖会见奥巴马的请求,这在美国历届总统对达赖问题的处理上是史无前例的。当然,这些都不能成为美国损害中国安全和尊严的借口,严正的警告和反制措施都是必要的。但是,中美总能走出台湾、西藏等敏感问题的“一道道坎儿”,长远来说时间在中国一边,已经被历次中美较量所证明。

所以,“中美新冷战”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我们所说的“冷战”有其特定含义,指的是以两大意识形态划线区分敌我、以两大军事同盟画地为牢相互对抗的战略和时代。中美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和碰撞,在国际舞台上最强的两股力量的相互合作与折冲樽俎,构成了中美关系以至世界政治的一些新特点。谁占领了战略制高点,谁有更强的运筹帷幄能力,主动权就会掌握在谁手中。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自2010年2月12日《环球时报》)

转变的进程。二是优化产业结构的任务尚未完成。34.46%的专家认为“十一五”时期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较差，另有48.31%的专家认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3. 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相对滞后。有67.79%的专家认为，“十一五”行政体制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改革的实际进程。

调查显示，“十二五”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1. 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已构成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巨大的外部压力。76.27%的专家认为“十二五”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改革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多数专家对未来五年世界经济走势抱审慎态度，49.72%的专家认为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将缓慢复苏，31%的专家认为“十二五”全球经济仍将经历震荡调整。在外部经济环境上，79.94%的专家认为“十二五”我国可能遭遇的贸易保护案将进一步增多。从这些判断可以看出，我国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80.51%的专家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更为突出，为此应当制定系统的对外开放战略，以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2. “十二五”经济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将进入高成本时代。合计有82.21%的专家认为“十二五”经济增长速度基本能保持在7%以上，其中56.50%的专家认为经济增长将达到7%—8%。58.47%的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我国将进入“高成本”的时代，这使得转变发展方式面临重要挑战。

3. 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推进改革。对“十二五”消费率的预期，56.49%的专家认为，如果采取得力的改革措施，“十二五”我国消费率有望提高到60%，居民消费率有望提高到50%。其中48.02%的专家认为，这取决于相关的体制机制创新。

调查认为，应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

1. 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有针对性地消除民营

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分别有66.95%、66.10%和47.46%的专家认为许多行业进入门槛过高和“玻璃门”、融资难和融资成本过高、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宏观调控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十二五”得到有效地解决。

2. 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置于“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位置。

——我国经济结构中的许多问题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关。80.23%的专家认为“十二五”时期应当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在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途径中，62.99%的专家认为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红收租”最为重要；54.24%的专家认为应当改善劳资关系，明显提高工资在GDP中的比重；44.92%的专家赞同明显降低财政在GDP中的比重，明显降低行政成本。

——以提高消费率为重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在提高消费率的举措中，68.64%的专家认为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阶层的收入对提高消费率最为关键。此外，分别有48.87%、44.35%和38.70%的专家认为构建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是刺激消费的重要举措。

3. 建立新型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十二五”是我国加快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合计有61.02%的专家认为，“十二五”是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到“十二五”末期我国城市化率有望提高到55%—60%，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推动力。

4. 按照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合计有83.33%的专家认为“十二五”有条件在中央与地方的财税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其中58.47%的专家认为宜逐步推进相关改革。在税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上，专家选择了完善资源税(68.08%)、征收环境税(54.52%)、完成增值税转型(41.24%)。二是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近年来，房价过高的问题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62.43%的专家认为遏制房价过高的最主要的手段是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摘自2010年1月25日《中国改革论坛网》)

吴敬琏：

产业升级、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究竟应该如何彻底步出金融危机？刚刚度过 80 岁生日的经济学家吴敬琏 2 月 23 日晚上在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外名家讲座上开出了一个药方：“中国经济应当继续深化改革，升级落后的加工制造等产业，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变现行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为有效率的集约型增长模式。”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和地方推出 10 万亿投资计划救急，吴敬琏指出，这类救急方案，没有与货币相对应的物质做支撑，容易出现货币超发、滋生泡沫，处理不好的话，不仅对根本解决危机无益，相反还蕴含了二次危机的风险，因此需要长远之计来彻底解决危机。长远来看，投资拉动的需求是粗放型的，普通居民收入增加形成的需求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让普通居民收入增加的方式则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产业升级，提升普通居民所从事的职业的地位。

“而且，我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蕴含极大风险。”他提到，为了保持出口的动力，外汇存比要大量增加，迫使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大量购买外汇保持低汇率，用低汇率支撑出口。如此一来，大量虚拟资产产生，泡沫形成。一旦虚拟资产在某个环节爆破，就会形成资产负债表危机，进而反映到整个经济层面。

如何实现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吴

敬琏认为，台湾从代工工厂成功实现产业转型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要推动我国制造业从加工、组装等技术和知识含量低、利润薄的“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以研发、设计和品牌、渠道为代表的两端服务业延伸。

另一方面，应积极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我国目前在很多领域已经具备了参与高端国际竞争、培育自己拥有知识产权拳头产品的能力，创新的技术力量一直在加强，但是我们的难点在于技术创新的产业化，政府应该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技术创新产业化获得大发展，争取我们的支柱产业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占有一席之地权利。

“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政府应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吴敬琏建议，政府可以以 PPP 方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伙或合营，本质上是政府部门和社会投资者之间一系列复杂的合约安排）提供共用性技术和组织，来解决知识产权侵犯的问题，鼓励技术创新。亦可通过补贴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扶持，由消费者进行选择，通过市场化手段消除补供方形成的“外部性”不作为。但是像“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这类没必要管，“非禁即入”。此外，还有政府也不需要指定技术路线、产品路线或者购买产品扶持。政府只需要确保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引导创新技术产业化则可。

（摘自 2010 年 2 月 24 日《第一财经》李晓晔）

制 | 度 | 反 | 腐 | 的 | 核 | 心 | 是 | 什 | 么

辛宇

改革开放 30 多年，是制度建党原则、制度反腐方略从认知到深化、再到确立的过程。制度反腐是主体以新的权力结构（而非旧的权力结构）为载体而开展的反腐败斗争。而制度建设最核心最具实质的问题是权力结构，健全有效的制度必然是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

制度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浅层意义上的规章、守则，二是深层意义上的组织体系。前者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大多以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的形式出现；后者是保证上述行为准则得以坚决实施的组织体系，通常以组织机构的形式出现。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作支撑，那些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制订得再多，也是一张白纸。但是，组织体系是否健全，取决于构成其结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个子系统的设置是否科学、结构是否合理，操作时能否有效地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

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使中央和有的地方，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必须从改革权力结构入手，走制度反腐的路子

这些年来，一方面，腐败易发多发的态势没有变；另一方面，对腐败的高压态势也没有变。反腐倡廉建设“正处于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的局面”，“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显然，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与产生于战争年代，成熟于建设时期的权力结构，确实存在着一种方枘圆凿，彼此不适的状态。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 8·18 重要讲话中强调，党内要进行必要的分权，为实行党政分开、党法分

开、党群分开、党社分开打好基础。“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十三大报告，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战略构想为指导，进行了具体的规划设计和制度安排。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冲击，以党内必要的分权为主要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度延缓。

这些年来，我们党在破解权力结构难题上，又有新的认识和实践。为解决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中央与省级党委组建了巡视机构，加大巡视工作的力度；为解决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的问题，中央和地方对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实施了统一管理。一些地方还在党章允许的范围内，加大了基层纪检监察力量的整合，分片、分线、分块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有的地方通过对“三重一大”事权的划分，全委会票决制的建立，以及空降任职、异地交流、对纪委主要领导提名权的改革，在党内原有的同体监督模式中，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分解尝试，使一成不变的同体监督中，渐渐增添了异体监督的成分。

我们党执政 53 年时，党的十六大在权力结构问题上形成了新的共识，强调“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5 年后，十七大报告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明确概括为“权力结构”。此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监督的制衡力”概念。权力结构的改革渐成热点。

古今中外的执政史无不证明，权力结构靠得住，制度才靠得住

中国时下关注权力结构中的“三权”，并非西方“三权分立”中的“三权”。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我们这里所研究和关注的“三权”是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设，西方权力结构中的“三权”是指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

党内民主要能真正成为党的生命，党员要能真正成为党内的主体，党要通过长期执政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党内权力结构的改革既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是必须的路径选择，而在这“三个科学”中，科学的制度是根本和保障。

制度到底科学不科学，不能用书本引证，也不能凭权威认定，只有实践才能检验，才能证明

什么是科学制度？在党内以法定的程序制订或认可，且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制度，谓之合党情；在我国历史上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制度，谓之合国情；在国外大范围长时间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制度，谓之合世情。这些适合党情、国情、世情的制度，科学不科学，关键在于合不合客观规律。因为，制度的核心是组织体系，即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科学了，才能称得上是科学制度，才能“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

但是，检验制度是否科学的标准只能来自于实践，证明于实践。因此，拿出一些地方来试点，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没有试点，不要轻言否定，成功了再在更大范围推广。有这种科学的制度即权力结构为根本、作保障，才能真正加强法治，才能真正“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问题的复杂性，通常不是来自于问题本身，而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远离源点的缘故

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搞了30年，形势仍然严峻，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但主要是解决腐败滋生蔓延这一问题的方法远离源点。腐败滋生蔓延与制度漏洞、制度设计有关，与对马克思“议行合一”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运用有关。借助10年“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放大镜，29年前，邓小平就

精辟指出：“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而解决总病根的治本之策，就应该而且必须从源点出发，实施党内分权，加快推进权力结构改革。

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要厘清三个关系，即授受关系、制衡关系和回归关系。

其一，明确权力的授受关系。权力只有来自权利，权力才会代表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党内民主的实质是党员当家作主。党员是党内权力的本体和授予主体，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是党内权力的代理者和执行者。党的一切权力属于党员，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权力源于党员的授予和委托。基于此，理顺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关系，明确党代会对全委会、全委会对常委会的权力授受流程和委托代理关系，以此确认党内权力的授受关系。

其二，明确权力的制衡关系。权利只有制衡权力，权力才会服从权利。监督权是宪法和党章、条例赋予党员的一项重要法定权利，是党员权利体系的重要构成元素，又是党和国家监督制衡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切实纠正只把党员当作权力监督的客体，忽视其监督的主体性，导致监督主体不全甚至缺位的现象，同时要自觉接受广大党员的监督，正确对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保障和落实党员的监督权；另一方面，广大党员要增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权利意识，着力打破党内监督的神秘化和封闭化，解决不愿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的问题，明确党员监督权的重点指向、重点领域和价值目标，切实防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

其三，明确权力的回归关系。权力只有回归权利，权力才会属于权利。党章作为党的权力结构和监督制衡体系的一项根本性制度，确立了广大党员在整个权力结构和监督制衡机制中的主体地位，明确了领导干部的权力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存在。既然权力源自于党员的授予和委托，就必须体现委托之秩序，履行之回归要约，以保证实现权力的本质归依和价值原则。

（摘自2010年2月5日《学习时报》）

公共财政也有廉政职能

傅光明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公共财政具有四个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调控经济职能；监督管理职能。其实，公共财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目前还没有人提出来，那就是反腐倡廉职能，可以简称为廉政职能。

何谓公共财政的廉政职能

所谓公共财政的廉政职能，是由公共财政的公共性与公开性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公共财政是公共资源，而腐败的产生在于偷窃公共资源，不正当地运用公共资源。公共财政还是阳光财政，而公开透明是廉政建设的本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国外财政收支一般占到GDP的1/3强，成为调控经济与社会的重要工具。以我国2007年的财政收入为例，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因此，保障政府依法行政、廉洁高效，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保障政府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政府执政能力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标志。

财政廉政职能有7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官员掌握着一定的政府权力和财政资金分配权力，必须在权力运行中建立廉政制度，接受人民监督，依法理财，消除权力委托代理失灵所产生的腐败行为。二是政府财政收支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重要领域，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发挥廉政职能是遏制腐败、加大政府透明度、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增强国家能力的条件。政府预算、政府税收、政府采购、政府非税收入、政府资产既是从源头上治理社会腐败的调控器，也与改善公民的经济利益

密切相关。三是构建财政廉政制度，是现代政治与反腐倡廉制度最核心的核心制度。四是政府机关既有监督财政资金管理的任务，又有自觉接受社会和民众监督的任务。五是政府公开透明的根本是财政预算的公开透明。六是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必须坚持政府精简高效，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是对贪污贿赂滥用财政资金的人员，必须依法惩处，收回国库。

国外建设公共财政反腐败的启示

公共财政所具有的廉政职能作用，无论英国、美国和我国的实践，都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

18世纪，英国成功地建立起一套稳健的公共财政体系，保障自由经济秩序加剧了新技术扩散，1700年到1820年英国成为霸权国家。但是未建立公共财政体系之前，英国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通过构建公共财政体系，通过健全廉政职能，英国从根本上杜绝了腐败现象。

美国在19世纪末面临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1880年—1930年，当时的观察家认为美国城市是非常腐败的。在美国很多城市，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重大灾难屡屡发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但危机也是转机，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制度建设，包括构建现代公共财政体系，设计廉政措施，美国从收入和开支两方面对其财政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在收入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引入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在支出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引入现代预算制度。纽约市在1908年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现代预算。以后几年，纽约市预算日臻完善。到1929年，所有的州都有了自己的预算法。国会终于在1921年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至此，美国的预算改革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预算改革对美国后来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

将各级政府行为的细节第一次展现在阳光下，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势头，从而改善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增强了政府正当性。预算的廉政职能对缓解美国社会矛盾可谓功不可没。

管住政府钱袋子的必然要求

我国目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成为当前我国腐败多发易发高发的最主要的形式。发挥财政廉政职能，管住钱袋子管好钱袋子是预防和遏止腐败的根本性措施。近年来国内查处的违纪案件中涉及资金动辄上百万元、千万元、甚至过亿万元，少数外逃的贪官卷走巨额资金，有的行贿者甚至用麻袋装着巨额钞票送礼。不能说这种情况的发生与我国财政制度不健全、银行制度不健全无关。

提出公共财政的廉政职能的意义在于更有效地发挥财政在反腐败中的重大作用：肩负着双重任务。既承担分配等职能，又发挥廉政的作用。它决定了财政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内部性，又有外部性；既有当前性，又有长远性；既有直接性，又有间接性；既有主导性，又有协同性。如在源头治腐上，对外要推进财政四项制度改革，对内要坚持实行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公开透明，尽量减少自由裁量权。要承担保证财政资金安全和财政干部成长安全方面的双重任务。认识财政制度具有反腐倡廉的作用和效果，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扩大财政预算的透明度，从财政收支两个方面促进全社会的源头治本和惩防体系建设。

（摘自 2010 年 2 月 8 日《中国改革报》）

警惕情趣腐败

张书林

党员干部的情趣虽然说到底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但党员干部是掌握公共权力的特殊群体，他们

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就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小节方面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其能否廉洁公正行使权力、能否抵御住由个人兴趣爱好所引发的情趣性权力腐败的大问题。因此，党员干部必须高度警惕两种类型的情趣性腐败。

一是警惕直接性情趣腐败。直接性情趣腐败主要是指领导干部因喜欢打牌、玩麻将等而沾染黄赌毒不能自拔，因贪恋美色而迷失自我，因追求物质享受而腐化堕落、吃喝玩乐、铺张浪费，因信奉封建迷信、迷恋求神拜佛进而产生腐败行为，等等。二是警惕间接性情趣腐败。间接性情趣腐败是指领导干部被别有用心之人“投其所好”，渐渐被腐蚀而产生的腐败行为。如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他们的情趣爱好本来十分健康，喜欢书法、绘画，喜欢收藏名人字画、古玩等等，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从中看到了拉拢腐蚀领导干部的机会，寻找各种理由、利用各种手段，或让领导欣赏，或请领导雅正，渐渐接近领导，使之在不经意中坦然接受，然后再寻找合适的机会提出非法要求，将党员干部拉到腐败的污水泥潭中。从一些腐败分子家中搜出来的大量名人字画、古玩文物等，就集中说明了这一问题。

党员干部要做到情趣健康，就既要讲操守、重品行，警惕黄赌毒、吃喝玩乐、封建迷信等的侵蚀，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更要警惕间接性情趣腐败的侵蚀。直接性情趣腐败容易被发觉，间接性情趣腐败则具有相对隐蔽性的特点。警惕、避免情趣性腐败，关键要高度关注间接性情趣腐败问题。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要自觉将兴趣、爱好、偏好限制在自我世界、个体层面，最多是在家庭范围，万万不可张扬自己的情趣爱好，给别有用心之人可乘之机。否则，就会有人“投其所好”，党员干部的个人爱好、个人情趣就会无形中被导入公共权力的运行之中，就会有人瞅准时机，让党员干部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圈套，被人利用，以谋取腐败利益。

（摘自 2010 年 2 月 3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去年 GDP 增 8.7%

中国经济 V 形反转

经济总体增长 顺利完成“保八”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如果说用不多的字来描述 2009 年，最好的字就是两个字——收获。

尽管 2009 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中国仍然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初步测算，2009 年国内生产总值 33535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7%，增速比上年仅回落 0.9%。全年经济总体增长，顺利完成“保八”。

分季度看（季度数据有所调整），一季度增长 6.2%（过去的数字是 6.1%），二季度增长 7.9%，三季度增长 9.1%，四季度增长 10.7%。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248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1%，增速比上年加快 4.6%；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53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6.9%，实际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2.1%；进出口总额自 11 月份由降转升，12 月份更实现 32.7% 的增长。

居民收入增长 就业好于预期

马建堂介绍，2009 年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好于预期：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 18858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75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5153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5%。全年城镇就业人员比上年净增 910 万人。年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 1.49 亿人，

比一季度末增加 170 万人。

民生领域投资增长明显加快：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增长 61.8%，教育增长 37.2%，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增长 58.5%。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36232 亿元，增长 16.1%。

粮食连续增产 工业增长可喜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2009 年，我国农业实现了很好的发展，粮食实现连续 6 年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53082 万吨，比上年增长 0.4%。

作为国民经济主导的工业同样实现了可喜的增长。2009 年我国工业生产逐季回升，实现利润由大幅下降转为增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1%，增速比上年回落 1.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季度增长 5.1%，二季度增长 9.1%，三季度增长 12.4%，四季度增长 18%。

2010 年 GDP “坐八望十”

从 2009 年这份亮丽的“成绩单”中，能看出 2010 年中国经济怎样的走势？多家机构和专家预测，2010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很可能保持在 8% 以上，甚至可能达到 10%。

马建堂表示，2010 年中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这有几大原因：世界经济总体是缓慢复苏的，总的环境比 2009 年要好；进出口对中国经济肯定是一个正拉动，不会再是负拉动；投资与消费总体上继续保持 2009 年的

势头。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预测,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在8%至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预计,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9%以上;更乐观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他预计2010年GDP增长率在9.5%左右。

最乐观的预测来自外资银行:渣打中国财富管理总部总经理梁大伟预计,中国2010年GDP增长速度有望达到10%;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预测为9%以上;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只要中国2009年强劲的国内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维持,且G3(中、美、欧)经济体继续保持温和复苏,2010年中国经济将实现更强劲、更平衡的增长,GDP增长将达10%。

三驾马车两升一降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发布分析报告,预计2010年三驾马车将呈现“两升一降”的格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将加速,投资增速将有所放慢,中国经济增长将重回上升周期。

在投资方面,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预计,2009年新开工项目的大幅增长将确保2010年投资增速不会大幅回落;从所有制结构看,政府投资增速将放慢,而民间投资增速将加快;从具体行业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将下降,而房地产投资会明显加速;而信贷增速放缓并不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大幅回落。

基于以上分析,预计2010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5%左右,比2009年下降8%,不过与2003—2007年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仍属于较快增长。

刺激政策逐步退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认为,经济增长已重回上升轨道,政策的

进一步刺激反而有导致经济过热的担忧,因此刺激性政策可能考虑有选择性地逐步退出,而未来经济中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通货膨胀预期持续增强和外资加速流入等问题应成为我国宏观调控部门重点关注的问题。

就刺激政策退出的先后顺序而言,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会先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迅速大幅收紧。

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将担当主要角色,利率政策的实施则将根据美国货币政策、国内物价、经济增长及资产价格等综合考虑而决定。积极财政政策在2010年仍会维持,但财政支出的重点方向将侧重于民生、消费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

今年物价温和可控

由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逐月上升,通货膨胀是否将由预期变成现实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回答相关提问时,马建堂表示,尽管去年全年CPI是-0.7,但去年11月、12月全国CPI已经由负转正,“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成功地避免了大家当时非常担心的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也警醒我们要高度注意物价走势。”

马建堂指出,今年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已经确定的宏观调控方针,更好地把保增长、调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结合起来,防止物价过快上涨,“我们将密切关注CPI走势,认真贯彻宏观调控方针,鉴于中国总供求的大格局和粮食6年丰收的情况,相信经过努力,今年的物价上升应该是温和可控的。”

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哪些困难

马建堂表示,虽然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讲中国经济在严峻形势下取得的成就,但并不是说中国经济不存在矛盾、困难和隐忧。

马建堂着重谈到引发他担忧的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既维持并推进经济持续回升的势头，又把物价的上升控制在温和可控的范围内；二是淘汰落后产能的问题，因为在中国淘汰落后产能是非常棘手、困难，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取得实际进展的问题；三是一些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货币政策既要推动经济增长，控制通胀预期，又要注意到资产价格的上涨并适当调控，完成好这样的任务是一个挑战。

马建堂表示，任何经济体在一定时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困难是正常的，相信中国2010年在继续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将会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民生，更加注重推进改革。

·相关链接·

2009年全年核心数据

GDP	国内生产总值 33535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7%，增速比上年回落 0.9%
物价	居民消费价格 (CPI) 比上年降 0.7%。 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 全年下降 5.4%
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248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1%，增速比上年加快 4.6%
消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53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6.9%，实际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2.1%
进出口	进出口总额 22073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13.9%。其中出口 12017 亿美元，下降 16.0%；进口 10056 亿美元，下降 11.2%。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1961 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994 亿美元

制图：吴尚楠

(摘自 2010 年 1 月 22 日《京华时报》记者马文婷等)

今年宏观经济政策 宜稳不宜退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 2009 年全年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呈现“V”型反转势头。但随“V”型图一起出炉的还有去年 12 月份快速回升的 CPI、PPI，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对 2010 年通胀压力、资产泡沫风险的担忧以及对 2010 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疑虑。

专家们表示，2010 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将延续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基调，但会依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局部微调，货币政策将回归常态，而财政刺激经济的力度也会有所减弱。经济政策整体取向是宜稳不宜退。

货币政策回归常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定的调，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不会变化”，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示，今年的货币政策还会保持适度宽松，但相对于 2009 年的宽松政策，今年更侧重于“适度”。

据 2009 年全年经济数据显示，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新增贷款大幅增加。去年 12 月末，广义货币 (M₂) 余额 60.6 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27.7%，增幅同比加快 9.9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₁) 22 万亿元，增长 32.4%，加快 23.3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40 万亿元，比年初增加 9.6 万亿元，同比多增 4.7 万亿元。而据相关部门预测，2010 年 M₂ 增速会降至 17% 左右，而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将降至 7.5 万亿元。

“2009 年我国货币政策总体来讲是极为宽松的，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但现在货币政策应恢复到正常状态。”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好转，货币政策应从过度宽松向适度宽松回归。货币供应量、信贷增长应控制在一个适度宽松的范围内。

此外,他认为,在当前流动性过剩和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很难实施。虽然2010年信贷规模可能会降至7.5万亿元,但还是有些偏高。“房地产业挣钱太容易,于是很多企业、个人就不愿意在自主创新或结构调整上投资,都转到了房地产上。所以要想调结构,促进自主创新,首先要让货币和房地产回归正常。”

据相关媒体报道,截至1月11日当周,中国央行已经在公开市场连续14周净回笼流动性,而且货币净回笼的力度已超过了此前2008年年初时那段货币政策较为紧缩的时期;从1月7日开始,央行也开始了逐步提升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的过程,目前一年期央票的发行收益率已经在此轮调整中提升了16个基点;1月18日起,央行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虽然最近央行举动频繁,但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吕随启表示,目前货币政策只是动态微调,收紧在上半年是不大可能出现的。爬坡的时候没有急刹车的理由,现在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尽管有通胀预期升温的问题,但稳定经济复苏的趋势可能比通胀预期升温还要重要。

财政政策力度减弱

对于2010年的财政政策,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1月10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上说,2010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重点在扩内需、调结构上下工夫,加快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09年全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绝对规模为建国以来之最。而2009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支出也超过7万亿元。祝宝良认为,去年财政刺激经济的力度已经很大了,从总量上看,今年财政刺激经济的力度会有所减弱,但不会一下子退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刚分析,去年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主要靠扩大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而今年危机缓解,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转为结构调整。因此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力度会有所减弱,重点主要放在扩内需、保民生上。而因为“4万亿”的大量项目已在2009年上马,

工期大多要持续两年或更长时间,因此财政上会延续2009年的基础设施投资,但增幅会放缓。

此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张晓晶表示,财政政策对于出口的支持力度应有所减弱。因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中,经济增长应该是依靠内需的平衡增长,而不应是依靠在不计成本的财政政策支持下完成的外需增长。但王小广认为,财政对出口的刺激政策收回来有很多阻力,并且当前我国的出口状况还未完全恢复,因此去年的政策还会延续。

“退出”有待观察

随着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通胀预期升温,目前对于我国经济刺激政策是否会在2010年退出,充满争议。专家表示,2010年经济形势复杂,政策应以“稳”为主,而不应轻言“退出”。

对于经济刺激政策何时退出的问题,吕随启给记者打了个比喻。他说,经济体就像一个病人,而政府就像一个医生,治好病后医生总要退出的,但医生何时走,取决于三种情况:病人的恢复状况;是否留下后遗症需要继续治疗;对病人前景的判断。

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刺激政策可以说到了退出的时机,但是还没有到政府敢于退出的时机。经济虽然已经开始复苏,但政府担心病情会有反复,因此不敢放手。可以说现在的中国经济正处于观察期。如果能够确定经济形势彻底好转,那么刺激政策自然会逐步退出。

“部分经济刺激政策不但不能退出,甚至还会加强”,彭刚称,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到了一个转变的关口,传统的发展模式受到了严重挑战,结构调整提上日程。2010年我国经济不仅面临反危机的问题,还要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因此,即使我们走出金融危机,但有利于调结构的经济刺激政策还应继续保留。比如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对自主创新企业的鼓励;对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转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的财政支持等。

此外,张晓晶认为,如果政府的刺激政策要退出,那么必须在社会投资能够跟进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没有进只有退,经济就会滑下来。

(摘自2010年1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

城市化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20 年

卢中原

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不是依赖外需。查阅《中国统计年鉴》，可以发现，2001—2008 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是主要的。因此，如果净出口的贡献没有了，并不可怕，我们可以依靠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2009 年，中国经济增长 8.7%。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外需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2009 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 8.7% 的较快增长速度，主要是靠投资、消费两大内需拉动的。没有这两大内需，2009 年经济增长的“保八”目标根本不可能达到。无论是为短期应对危机，还是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我们都必须坚持立足于内需。中国经济有深厚而巨大的需求潜力，其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首先，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产业结构也正在调整，这无疑需要大量投资。我们研究发现，近十多年来，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是投资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正好揭示了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现象。第三产业当中，恰恰包括了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而在中国目前城市化和工业化双加速的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投资。

2008 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刚刚达到 45.7%，仅接近于 2001 年世界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曾经

说过，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有两大动力，一个是以美国高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这是他从多次访问中国的所见所闻中得出的结论。根据世界经验，城市化程度达到 70% 左右才能保持基本稳定，我们中国还有 20 多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一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就会创造出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20 多年。

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自己的发展阶段，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改造传统农业和工业，加速发展服务业，促进大量农民转到城市和非农产业，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是我们巨大的投资需求来源。

其次，中国的消费需求潜力同样巨大，消费结构正处于全面提高小康水平的新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头 20 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由贫困进入到温饱，再由温饱跨越到了初步小康阶段。到 2020 年，中国要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这时候老百姓消费升级的热点主要是改善居住、出行和交往的条件，包括购车、买房、买手机、当互联网用户等。

中国城乡居民的这一轮消费升级，至少将持续十几年。我们看到，中国人均 GDP 水平只有 3000 美元，但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我国的手机拥有量也位列世界第一。这无疑是不平衡的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过去，我们靠改善基本生存条件的消费热点，可以拉动轻工业、农业、纺织业。现在老百姓新的消费热点拉动(下转第 30 页)

陈锡文解读中央农村发展新政：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

统筹城乡发展，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央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大战略性提法，第一次是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来的。从大的背景来看，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点。2004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所以，今年一号文件中提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并不是说从现在开始实行，而是要求加大力度。

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就是要加大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力度，逐步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夯实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统筹城乡发展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总体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就是要加大各种要素向农村转移覆盖，帮助农村更快地发展。

这几年城镇化发展非常快，特别是在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设施的建设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城市你3年不去，可能根本就认不出来了。但是，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变市民，在这个方面的进程却还非常缓慢。对此，中央的要求很明确，一是要加快中小城市和中心镇的发展，二是要把具备条件的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也就是说，今后推进城镇化，不是单纯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和设施的建设，而是要真正把农民转移到城镇中来。

因为这些年大城市规模扩张比较快，财富积聚相当集中，产业大多分布在这些地方。人口分布总是跟着产业走。总体上看，一定空间的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现在大城市已经超载，使得大城市的生活质量下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所以，中央提出了要把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放到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大城市主要是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强辐射带动能力，提高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

现在统计上有界定，200万人以上的是超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是特大城市，50万~100

万人的是大城市，20万~50万人的为中等城市，20万人以下的是小城市。当然这个指标也要根据现实情况有所变动。应该讲，现在发展最快的，是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这些基本都属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那么今后重点要发展的，主要是内地的一部分地级城市，以及县城和中心镇。县城的规模一般在几万人、十几万人，多的可能就是二三十万人，其发展潜力非常大。对于农民转移来说，中小城市的门槛也比较低。我们最近在河南洛阳调研也发现，农民愿意进城的很多，但76%的人愿意进的是县城，连进洛阳市都不敢想，因为大城市房价和生活费用太高，农民很难接受。

所以，我们应该创造条件，通过发展县域经济，为县城和中心镇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这就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每年建设用地的指标分配。现在我们建设用地指标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县和县以下分到的非常少。应该把用地指标适当向内地、中小城市倾斜，引导产业布局朝这些地方转移。第二是要提高大城市投资项目的准入门槛，包括环保、技术、产能的门槛，引导产业向内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第三是要加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它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第四是推进财税、金融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使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能力去做这些工作。政策措施在软件硬件两方面，都应该落实把中小城市、县城和中心镇作为发展重点的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所做的报告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使稳妥推进城镇化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双轮驱动。最近，温总理在几次讲话中都提到，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要良性互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对此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城市要为有条件的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创造条件，同时还要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把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把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使留在农村的人能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中国的特殊国情就是农民多，如果从人口的城镇化来看，这一定是一个渐进和漫长的过程，就是说，短期内不要指望大多数农民都进城当市民。我们算过，如果我国的人口到了15亿，就算城镇化率达到了70%，农村也还有四五亿人。所以，一定要坚持双轮驱动，不能偏颇，不要认为强调了城镇化，就可以忽视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手抓，不仅是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着力点，而且是我们国家所拥有的一个长远优势。发达国家这些建设已经搞完了，而我们的城镇化建设空间还非常大，新农村建设的空间也非常大，这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拉动多大内需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今后几十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摘自2010年1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冯璞冰等）

搞城镇化 应多鉴他山石

王龙云

“这是城市中最糟糕地区的最糟糕房屋……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住在这里的是穷中最穷的人，是工资最低的工人……”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如此评价当时伦敦东郊的贫民窟，成为刚刚跨入工业社会门槛的英国渐进城市化的真实写照。160余年后，这样的光景在伦敦街头已难觅踪影，但在印度

的孟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等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形神兼备的复制品同样令世人唏嘘。

每一个走向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在实现城市化（注：英文为urbanization，国内一般称之为城镇化或城市化）的过程中，都得经历类似的磨难吗？都必须有一部分人充当时代的牺牲品吗？西方发达国家给出的答案有的令人神伤，有的令人神往。他们的历史还说，城市化是一条漫长而曲折之路：英国用120年才算走完，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也用了40年……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只是“在路上”而已。不妨看一看一些典型国家的道路选择。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实现了高水准的城市化，一来是因公共设施健全的小城镇在稳定就业上发挥了巨大吸纳的功效，二来是因完善的法律体系一视同仁，由宪法规定的选举、工作、迁徙、教育等公民权利没有城乡差异，才使农民——这个城市化进程中利益最容易受损的群体得到了充分保障。

二战后日本经济依靠制造业实现腾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妥善解决了大量农民进城后的户籍、住房和各种社会福利问题。在1955年至1970年间，东京每年的人口净流入量高达30万至40万，但日本政府通过修建放射性大容量的轨道交通，开发公共设施齐全的卫星城镇，成功避免了“城乡结合部”和“贫民窟”的出现。

历史还告诉我们，各国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处理贫民窟问题，一定要与本身的资源禀赋、社会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让底层居民在逐渐改善的公共卫生和居住条件中享受到应有的安全、便利与舒适，同时还要警惕两种态度：坐视不管与冒进图快。

印度孟买近些年推行城市“美容”，推倒贫民窟建楼房，以此改善贫民居住条件，但此举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生态，政府又没有相应的安置措施，反而令不少当地贫民没了生活来源。新建的贫民公寓设施差隐患多、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一些在城内谋生的底层人群只能一周回家一次，平时只好露宿街头。这样好心帮倒忙的例子在发达国家也曾有过，都值得其他国家引以为戒。

（摘自2010年2月5日《经济参考报》）

只有城乡统筹 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彭真怀

统筹城乡发展，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必由之路，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统筹城乡发展是在党的十六大上首次提出的，十七大继续强调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给予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日前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统筹城乡发展、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

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地区，农民是弱势群体，这一点已被大家完全认同。从统筹城乡发展看，小城镇是县域经济的增长点，是连接城乡、工农的基地。今年一号文件抓住小城镇这个城乡节点，实质上是表明这样一条清晰的政策思路：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促进小城镇发展；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保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优先发展小城镇事关城乡统筹能否真正落实，事关我国经济能否具备内生的动力和基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统筹城乡发展要以小城镇为重要抓手，并配套与之相关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要办的事情很多，但要分轻重缓急，既要量力而行又要讲尽力而为。小城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物质载体，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点，是亿万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直接体现着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状况、农村面貌、农民生活乃至

农村文明的总体水平。

令人高兴的是，今年的一号文件从全局分析和把握形势，提出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重点，加快城镇化步伐，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这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对于国家未来走向影响极其深远。以小城镇为单位集中整合政策措施，打捆使用惠农资金，不仅符合客观实际，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合力，而且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意义。我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推动作用。

一是有助于探索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城乡规划、基础设施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是有助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逐步消除对农民进城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的城乡关系。

三是有助于为农民创造条件立乡成才，特别是有利于在外务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回乡创业。

四是有助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管理好基层环卫、治安、精神文明等事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腿长、农村腿短”的现象十分严重。在大中小城市的建设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时，小城镇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国家统计局披露的一组数据表明：我国近4万个乡镇，有78.5%的中小学存在需要重建的危旧房；有60%的农民没有卫生厕所和污水处理

场;有50%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公路和电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1:1扩大到3.23:1,年均扩大0.16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农民生产性投入、很少获得社会福利补贴等因素,城乡差距实际达到5:1或6:1以上。

需要强调的是,中央早在1998年就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并在2000年6月专门下发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此后的历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中,也反复提出要搞好小城镇建设。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明确: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从财政、金融、税收和公共品投入等方面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条件,外来人口较多的城镇要从实际出发,完善社会管理职能。

以小城镇为重要抓手的统筹城乡发展,我有一个初步的预期目标,到2015年,70%的行政村和乡镇有上下水设施,污水处理达到国家Ⅲ级排放标准;80%的行政村和乡镇面源污染、工业污染治理程度达到国家标准,解决饮

水不安全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90%的行政村和乡镇道路达到国标规定的通达、硬化水平,实现太阳光电能源、风能、沼气等多种形式的能源基本自给。在具体实施步骤上,我建议2010年重点抓1%的小城镇(约400个乡镇)进行试点,适时推广试点典型经验和做法,2013年全面启动。

根据今年一号文件的总体部署,我相信小城镇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小城镇在发展方向上开始发生3个重大变化:一是工作方法的重大变化,从传统的农业角度讲小城镇发展,推进到从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角度讲小城镇发展;二是国家支持方式的重大变化,除了保证已有的惠农、利农、助农的各项政策不会改变以外,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更加相对集中地关注小城镇发展;三是各级政府重视程度的重大变化,从以往的地方推动向中央推动转变,小城镇发展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摘自2010年2月3日《科学时报》)

(上接第26页)的将是住宅、建材、装修、钢铁、机械加工、橡胶、化工、电子、城市规划,以及汽车美容业等更多产业,包括催生一些新兴行业。现在,由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正成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在2008年底2009年初中国经济最困难时,我曾反复强调,不要过于担心中国的外需大幅度下降,靠我们两大内需可以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因为中国有这样巨大的内需潜力。现在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回暖。一方面靠的是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另一方面,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的贡献功不可没。

因此,我说相信中国吧。有这样强劲的两大内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保持较快的增长?对“十二五”期间(2011—2015)中国经济的不少预测表明,增长速度平均可以达到8.5%—9%之间。未来5年,世界经济是什么样呢?可能有一段低速增长期,至少在最近两三年,大多数预测都认为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期。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对外部环境、外部需求、外部订单难以寄予更多希望,仍然要着力扩大中国两大内需,同时也希望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的贡献更为平衡一些。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摘自2010年1月25日《环球时报》)

新媒体时代：

处置突发事件的“黄金4小时”法则

“黄金4小时媒体”崛起

近两年，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09年，在杭州“飙车”案、昆明“螺蛳湾”事件、赤峰“自来水污染”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巴东邓玉娇事件、“番禺垃圾门”事件的背后，频现新兴媒体的身影。

传统观点认为，官方处置突发事件有“黄金24小时”之说，即在事发24小时内发布权威消息主导舆论是平息事件的关键。新兴媒体崛起，渗透并深刻参与到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的“黄金24小时”法则渐显无力。

基于多年对网络舆情的分析，以及对当下媒体环境的判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了突发事件中的“黄金4小时媒体”概念。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胡江春解释说，“黄金4小时媒体”主要指能产生快速舆论传播的网络媒体，以微博客、QQ群、人气高的BBS论坛等为代表。

网络媒体快速的传播速度会导致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每一个网络信息的接受者又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在数小时内，“黄金4小时媒体”就可能将突发事件传播、发酵为有着重大舆论影响的事件。

“4小时”是考虑了需要厘清事实真相、政府各部门协调工作和完成信息披露文书所花时间所得。”胡江春说。

129字微博定成败

胡江春认为，政府应该学会并善于运用“黄金4小时媒体”，处置突发事件。近两年的成功案例中，较典型的就是昆明螺蛳湾群体性事件。

2009年11月21日上午，昆明螺蛳湾市场因拆

迁问题发生上千商户集体上街堵路事件。下午2时许，螺蛳湾片区周边治安和交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

下午3时许，昆明警方就在云南网等网站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情况。同时，省政府新闻办在新浪网开设国内首家政府微博——“微博云南”，发布新闻，于当晚9时35分发布了有关螺蛳湾事件的129个字的新闻（含标点）。

“微博云南”让政府发布的消息在微博客中传播开来，并且在QQ群、BBS论坛等网络载体中广为流传。

胡江春提醒说，评价这个事件的处置效果，不能只看发生了什么，更要看避免发生了什么。上千人聚集，正是因为处置得当，信息披露及时，才得以迅速化解，避免了群体性事件被强行压制下去后的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避免了瓮安事件、陇南事件那样严重的街头骚乱。

2009年新疆兵团“最牛太太”事件中，当地政府利用天涯社区发布处理结果，迅速平息了社会舆论，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媒体和网民的赞赏。

一个反面例子是河南杞县钴60卡源事件。当地政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瞒报事故，导致大量居民夺路而逃。

“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政府应当与新兴媒体形成良性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

2008年11月，瓮安事件、陇南事件发生以后，来自全国的500名县委书记走进中央党校集中培训，学习“如何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随后不久，公安部又把全国的县公安局长叫到北京来培训。培训中，既讲宏观理念，也教授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措施。

破解新媒时代“时间压力”

对于“黄金4小时媒体”的说法，单光霁表示赞同。“无论是突发事件还是公共危机，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时间压力。”单光霁说，“一是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事情做出判断、认识和评估；二是怎么处置，危机事件来临时，既有危险，也有机会。”

随着通信技术手段的进步提升，来自“第一时间”的压力在不断增大。过去需要几天或几个月传递的信息，现在几分钟就能实现，甚至可以近乎同步直播。

在前不久发生的海地地震当中，由于主要通讯线路的中断，微博客成为传递资讯的主要平台，在关键时刻发挥出巨大作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注意到，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新兴媒体的优势就已经初露端倪。普通公民借助“非正式”媒体，作为“公民记者”，报道接近实时。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2008年初，曾经轰动一时的陕西绥德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事件中，一位宣传部长的话入选当年“官员雷人语录”。

这反映出部分地方官员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茫然无措。现实中，很多基层干部对媒体、特别是“黄金4小时媒体”缺乏基本的认识 and 了解。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有的组织结构和系统设计尚不能完全适应对突发事件的要求。尽管国家和地方都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在现实操作中，很多人还是按照传统行政组织体系，层层请示汇报，在原地等待中失去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速报事实、慎报原因”，已经成为相当多地方法领导的共识。天津市长黄兴国在后面又加上了“再报继续”，即把政府已经做过的、正在做的、将要做的措施和办法向群众说明。“早讲话、会讲话、讲真话”。

无独有偶，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曾根据自己实践总结提出过类似的思路，“快报事实、慎报原因、依法处置”。

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出来以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直接对话出租车司机，倾听当事人的需

求和想法，通过电视画面现场直播，对解决问题、平息舆论起到关键作用。这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凸显了政府与民意互动、真相与谣言赛跑的意识。

1月26日，在“新媒体高端论坛”上，作为嘉宾的胡江春和单光霁各自以一句简短的话作结。

“善用新兴媒体、提高执政能力。”胡江春说。

“第一，善待百姓，善待媒体；第二，双向沟通，良性互动。”单光霁说。

·相关链接·

几种主要的 “黄金4小时媒体”

微博客：随时发布只言片语

一种迷你型博客。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即时通讯软件、网页等方式接入，随时发布只言片语，随时关注自己关注的人。由于可以通过手机发布信息，摆脱了设备的羁绊，可以做到现场直播，传播速度极为迅速。在邓玉娇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广州番禺事件中，微博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QQ群：滚雪球式复制传播

一条信息在群里可以“N×N”次方的速度传播。网友从一个群获得最新信息后随手转发到自己的其他群与群友分享，其他群的网友再照此转发，信息可以在瞬间传播开来。

BBS：互联网舆论主要集散地

BBS按照网友感兴趣的主体，分成若干个布告栏。中国人气旺盛的综合性BBS论坛有强国论坛、天涯社区、百度贴吧等，BBS论坛的热门帖子经常会吸引传统媒体的关注，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互动。汶川地震期间，《我是汶川人，有个地方特别适合空降！》的帖子就是在经过近2000次转载后，被救援部队看到并采纳，在汶川境内成功实施空降。

（摘自2010年2月7日《人民网》记者李鹤）

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成执政最大挑战

首个国家级应急培训基地将在国家行政学院挂牌，采用案例教学对高中级官员进行轮训。这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家行政学院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说，中国未来面临的五大问题，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点。

第一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这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出现了背离；

第二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会引发不安和动荡，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腐败，腐败永远是人们对政府意见最大的地方，现在的腐败已经从腐败事件转化为一种腐败文化，这是很危险的，未来10年，国家反腐成效的好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第四是就业问题；

第五是社会信任感的丧失，这种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而这恰恰是一个国家的软价值，信任感缺失，足以给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竹立家认为，党政干部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不足，从石首事件和瓮安事件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从内容上，危机分为三种：第一类是社会矛盾诱发的群体性事件；第二类是突发事件，比如矿难；第三类是自然灾害，比如汶川地震。其中，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难度是最大的，因为每个群体性事件诱发的社会矛盾的节点不一样。

拿瓮安事件来说，首先，政府处理事件的程序和过程不透明。涉及群众情绪的事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公开事情的全过程，避免谣言的出现和散布。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是伴随着谣言，所以政府必须成为消息的第一和最终出口。

现在地方的一把手，从观念和意识上还没有确立起要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消息的意识。

我们国家处于转型期，必然要触发很多利益冲突，发生群体性事件很正常。但是现在的地方官员对群体性事件非常害怕，都觉得会影响政绩，这就客观上提高了信息公开的难度。

从公开的方式来说，也缺乏基本的技巧。一个事情出来了，官员应该怎么说，公安局应该怎么说，新闻媒体怎么说，完全没有准备，大家各执一词，造成了舆论场的混乱和老百姓的不信任，更加激化了矛盾。

另外处理结果和处理程序要公开，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再到三鹿奶粉事件，在一些重要节点上，地方政府处置的都有问题。

培训基地培训的内容和方式主要是通过案例教学，情景再现的方式进行技术细节的培训。

竹立家说，培训重点应该是县市级领导。过去我们也做过省部级领导的培训，但是最接近矛盾核心的，还是县市一级。

培训对象大致也要分为三类人：决策层、执行层和政府新闻发言人。

对决策层，也就是政府一把手，培训重点是从意识上树立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观念。

对执行层，像公安局、政府各部门、质监局、卫生部门、能源局等等，重点是要告诉他们，群体性事件爆发了，他们必须首先赶到现场进行协调指挥，不能等政府发话才到现场去。而且一些不相干的执行层面的官员不能轻易说话，更不能跟媒体和公众乱说话。我们的地方政府，现在大部分都有新闻发言人，以后必须通过一个出口来公开事件的有关信息，就是通过新闻发言人。

而对于政府新闻官员的培训，重点是如何及

安全生产是否出现“拐点”

我国伤亡事故死亡人数已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且与GDP增长幅度开始负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到2009年底，我国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已连续6年稳定下降，年平均幅度达到5%以上。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发展规律产生了重要变化。2003年以前，工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指数与GDP增长幅度呈明显正相关，2003年后，在我国经济发展持续增长背景下，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未升反降，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介绍，这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拐点”时期的特征。

近年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例如2001年开始建立国家安全生产监察体系，2002年出台安全生产法，2005年建立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安全发展”原则。刘铁民认为，重大政策干预措施对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并且表现出强劲和持久的后续推动力。尤其是在近年来工伤事故死亡人数持续下降后，政策干预度并没有出现减弱趋势，反而更为增强。

刘铁民特别强调，所谓安全“拐点”，并非某一具体年或月的时点，而是安全生产各项统计参数出现趋势性改变的一个观察时段。

虽然目前我国已进入安全“拐点”时期，但安

全生产工作仍不能松劲、不能盲目乐观。刘铁民认为，拐点时期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只有通过长时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开展更加科学有效的工作，才能逐渐向安全稳定期迈进。

刘铁民建议，在新的形势背景下，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对传统安全生产管理理念和方法不断完善与创新，强化基础性工作，逐步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一是完善现代安全生产监察体系，逐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四级运行机制，避免上下之间职能交叉、重复和行政资源浪费。二是建立专业化监察队伍，通过建立安全生产监察员执业资格管理制度，提高安监人员的素质，保证法规政策的执行力。三是建立激励相容与绩效评估机制，使政府、企业、个人等每个参与方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也能达到总体设定目标。四是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风险分级监察，即在对企业伤亡事故和职业危害风险评估基础上，进行风险排序分级，按照“风险优先”的原则，集中监察资源，重点监管占总数不到20%的高风险企业，强化对重大事故隐患监控和整改。五是强化重大事故灾难应急准备能力，通过建立标准化应急管理程序，创新应急管理模式，提高应对各类复杂灾变的指挥协调能力。

（摘自2010年2月4日《安全文化网》记者鲍丹）

时发布事件信息、处理方法和处理程序。另外就是如何说话。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政府官员的一句话，让事态变得更糟糕。

危机分为两种：一种是技术性危机，一种是经验性危机。2004年出现SARS，属于经验性危机。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处理得不算很好。后来总结了一些教训，在应对甲型流感的

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套应急预案，应对比较得体，所以甲型流感就成了一个技术性危机。

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该有能力不断通过危机处理的案例来总结经验，以最快的速度把经验性危机转变成技术性危机。这也是我们国家危机处理的发展方向。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期记者米艾尼）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 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

叶小文

时代不同了。今天涉及“西藏问题”的主要矛盾，既有国家主权问题，又有社会发展和变革问题。国家主权问题已解决，但境内外分裂分子不会甘心，不断捣乱；社会已经发生了伟大变革——从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从封闭保守到开放进步、从贫穷落后到快速发展，但变革还只是开始，有待深入。变革就会引起矛盾，发展之年就有“多事之秋”。分析1959年、1989年和2008年的三次闹事，从外因看，固然是达赖分裂集团加紧活动；从内因看，则因西藏实际上在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1959年是推翻农奴制建立新制度的社会革命，现在则是西藏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变革。达赖集团千方百计利用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利用宗教蛊惑群众，里应外合挑起事端。无风不起浪，“风”当然源于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的达赖集团。

因此，我们今天的治藏方略，就需要更为自觉、主动地指导社会发展和变革。这件事如果说清朝没有做，上世纪50年代我们是被动去做，今天就必须主动去做了。我们在西藏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据，是始终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过去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是促使西藏社会基本制度实现深刻变革；现在拉着西藏一起走到现代化前列，是推动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深刻跨越。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规律，“跨越式发展”的成本和代价，必然是深刻的社会变革。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

“旧社会的胎胞里”发育成长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不经过一场脱胎换骨的深刻变革，就永远是桎梏新生产关系的“旧社会的胎胞”。

旧的宗教，往往是旧制度的守墓人所祭起的、在新制度的群众心灵中徘徊的幽灵。达赖的“中间道路”，其本质是对西藏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反动。达赖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自治，就是不断祭起这个幽灵，夸大藏传佛教的特殊性、神圣性，来阻碍西藏社会发展和变革。其公式是：西藏 = 宗教的西藏 = 文化的西藏 = 藏人的西藏 = 宗教的自治。这是在把宗教极端神圣化，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把宗教与民族一体化，把教权与政权结合，回归到旧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我们对西方民众在西藏问题上要取得话语权，强调“反分裂”、批达赖搞变相独立，是必要的，但还未全部打中要害。达赖集团将其对西藏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反动，巧妙地用西方的普适价值和共同话语（民主、宗教自由、人权）包装起来。而我们推动西藏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进步事业，却没有能让西方民众联想到他们当年摆脱中世纪的黑暗的进步事业。今天的西藏固然要保护“香格里拉”的独特的藏族文化，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地。但绝不要保护野蛮和落后，也不是要保护作为旧制度的辩护者的一尘不变的旧宗教。西藏的文化保护必须与整个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团结、幸福相适应，而不是作为“活化石”在固化了历史的同时窒息自身的生命与活力。我们和达赖集团的本质区别，不是要不要保护藏族的文化，不是要不要保证“西藏文明的延续”，而在于谁才是真正着眼于民族的根本利益。西藏文明的延续，只有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

同时，才能更好地保存，而不是打着“保留民族特点”、“保护宗教文化”的旗号，让一个民族衰落下去，让藏族回到“全民皆僧侣”的所谓的“佛教圣地”的落后里去，回到“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去，回到农奴制度的野蛮中去。

世界宗教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反复证明，宗教适应社会的发展，往往要经历自身变革的过程。今天西方的基督教新教（Christianity），其前身就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摆脱代表封建势力的罗马教廷的束缚，而高举“因信称义”旗帜，对天主教（Catholicism）实行改革而拉出来的“抗罗宗”（Protestantism）。今天西藏的黄教，也是宗喀巴推行宗教变革的产物。

我们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藏传佛教，这种“积极引导”的强度和力度、方法和策略，与其他地区、其他宗教肯定是不一样的。今天的焦点，就是要具体到“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这就要触及“体”，“体”要消肿；要触及“神”，“神”要定位；归根到底，就要触及“教”，“教”要改革。体要消肿，神要定位，教要改革，这是对寺庙的工作真正做到“进得去，站得住，有成效”的需要；是西藏打破“闹事——整顿——再闹事——再整顿”的循环，为长治久安营造社会基础的需要；也是冲破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寺庙膨胀和宗教热、解决与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形成冲突的二元结构问题的需要。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如何取得突破？在宗教的“人、场所、活动”这三个要素中，首先能管住的是场所。要以实现寺庙管理规范化、法制化为着眼点，以解决寺庙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为突破口，以各方面齐抓共管为保障，切实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如何争取深入？要鼓励和支持藏传佛教界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教规教义中好的东西要坚持，如有关大活佛转世的一套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不适应甚至桎梏西藏跨越式发展的东西则需要摒弃。现在，现代化的观念

已开始深入到部分藏传佛教信仰者的心中，支持藏传佛教在某些方面改革和向现代转换的人也在增多。此外，还要千方百计去充实、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宗教的影响就难免乘虚而入。何况，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充实、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身就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精神空虚的社会，跨越式发展不能持续。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如何扎实推进？必须在西藏实现彻底的政教分离，实现宗教与基本民生需求相分离。西藏的农牧民子女都享受“三包”，全部进高中，就会大大减少未成年争着进寺庙的现象；西藏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得到完善，就会大大减少有病就去求寺庙的现象。群众对未来天堂的幻想就不会妨碍他们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同时，要明确刚性的界限：凡僧尼概不参与分裂祖国活动、不参加扰乱社会秩序活动；凡寺庙概不干预行政、司法、教育。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如何击中要害？必须旗帜鲜明、扎实有效地深入地揭批达赖集团，揭穿其假和平真暴力、假自治真分裂、假对话真对抗、假神圣真祸教、假护藏真害藏的真实面目；认清达赖集团是代表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残余势力、受国际敌对势力支持和利用、破坏西藏发展稳定、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归根结底，要依靠大批本民族的先进分子。对藏族干部要有特殊的关心培养措施。对宗教人士，要尽可能促进他们内部发起、自我觉悟、自我推动这场深刻的变革，才能积极稳妥，稳中求进。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协会副会长）

（本文为作者在中央党校第46期省部级干部研修班“学员论坛”上的发言。摘自2010年1月25日《学习时报》）

带着学习的激情解读世界

孙家正

上海世博会是全世界的盛会，这次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重要而精彩，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这个主题，符合我们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也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人文意义。

不同文化的汇集和切磋

世博会是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盛会，与奥运会、世界杯并列为世界三大盛会。世博会虽然竞技性不如奥运会和世界杯强，但就其内容涉及的广泛以及世博会和人民生活关系等方面来看，它都是无可比拟的。世博会充分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它更多的是人心的沟通和交流，是不同文化的汇集、切磋，有些重要理念的形成将影响深远。世博会的历史表明，历届所体现的往往是人们对世界的最新认知，是人们的物质和精神追求的集中展示。时代不断向前发展，每一届世博会的主题都是新鲜的，都会富有新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寻找带有价值取向的理念

当今世界迅速走向城市化，世界城市人口已超过50%，中国城市人口也正在迅猛逼近50%。城市的发展，早已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防卫和贸易功能。城市实际上已经成为多数人期望的安居之所和精神家园。城市化的发展在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和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和困惑。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全世界都在期待这次世博会能对这个问题做出新的解读。这个回答将代表全人类的智慧。城市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物，而是不断发展着的有机的生命体，而文化就是这个生命体的灵魂。中国的城市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城市是农民哺育起来的，反哺农村、善待农民，这将是中国城市化的特点。中国是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崛起世界瞩目。现在，人们都在研究中

国现象，研究中国的经济及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追求和谐世界的理念，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赞许。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一个问题，城市究竟应该怎样发展？我们究竟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究竟期待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如果这些带有根本价值取向的发展理念没有搞清楚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努力很可能都会南辕北辙。把这些问题想清楚解决好，其意义将会远远超出世博会的本身。所以我觉得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抓住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注定了它将是一次充满学术性、思想性的世博会。而思想性和学术性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通过世博会来深化我们的认识，加强与世界的沟通，表达中国与世界共赢的愿望和宗旨，这是极其重要和有益的。主题的演绎、解读和交流，始终是世博会的灵魂和重点。工作千头万绪，应注意防止思想淹没在事务之中，重点淹没在一般之中。

进步后仍要了解学习世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取得巨大的成功和进步之后，永远保持了解世界的热情，仍然如饥似渴的学习，吸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防止发达以后的自我封闭，是其能够不断发展进步的最重要的条件。世博会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始于世博会。1851年举办的第一次伦敦世博会首次展示了蒸汽机和电报，由此拉开了人类工业文明的新纪元。158年以来世博会已在近30个国家举办了130多次，每次都是在科技、文化、艺术、建筑、生活等各个方面引领时代的发展，产生了思想的碰撞，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学习、竞争或进步。世博会是世界科技文化最高的展示中心。上海世博会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惊喜呢？随着传媒特别是网络飞速发展，科技成果的展示几乎与诞生

同步。世博会上能出现的轰动性科技发明的新闻也许越来越少了。但是文化价值和理念的探索将会深入，它所带来的影响，也许并不亚于革命性的科技成果，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这次世博会确实是我们展示自己、宣传自己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以更加博大的胸怀和虚心的态度来关注世界、学习他人。这是我们了解世界、学习他人的极好的机会。当年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十年内乱，封闭了，停滞了。不知道世界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小平同志要大家睁开眼睛看世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发现和正视自己差距，激起我们奋起直追的热情和决心，迅速的学习新的东西来发展自己。30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如饥如渴的了解世界，学习借鉴他人的兴趣是否已经开始下降了呢？上海世博会是把一个浓缩了的世界送到了家门口，它会让我们大开眼界，让我们警醒，同时，也会令我们振奋。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愿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发现，中国通过30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就将列为世界第二位了，但中国仍然保持着清醒和虚心，还在如饥似渴的了解世界、学习世界，这样的民族是不可小视的。

每位国人皆显示民族精神

对于中国人来说，看世博就是看世界；对于外国人来说，看世博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上海、看中国。我们民族的精神和品格，不仅表现在中国馆里及陈列品上，更多的是表现在中国人身上。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到世博园区来参观的中国观众，每个人都是中国的名片，是中国文化最具体、最生动的展示者。诗人卞之琳有一首诗，写道：“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要使每个来参观世博会的中国人意识到，我去看世界，世界也在看着我。中国人在发达以后，更加热情友善、虚怀若谷，更加积极进取、又从容淡定，中国人特有的那种博大谦和、如饥似渴向世界学习的态度，将会感动世界。外国观众从他们接触过的一个个具体的中国人身上感受到整体中国文化的魅力。

（作者为原文化部部长）

（摘自2010年2月2日《文汇报》）

把握中国

的

国际定位

刘建飞

伴随着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已无悬念。然而，这种抓人眼球的崛起势头也带来一些问题，“中国责任论”又起高潮就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一些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担负同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有些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加大对他们援助的力度，等等。

应对“中国责任论”早已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应对失当，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崛起进程。按说，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对世界负有一份责任，因为地球是大家共有的，地球的资源是共享的，国际秩序是共建的，因此，大家都有责任来维护国际秩序，共同保护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当然，国家有大小、强弱、贫富之别，不同的国家能承担的国际责任肯定是有区别的。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国际社会寄望她能多承担一点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尽管有些西方大国在强调中国责任时，含有“忽悠”、“捧杀”中国的味道。如果逃避应承担的责任，肯定有损国际形象；但是，如果承担本不该承担的责任，又会使国家超载，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速度，损害国民利益，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

由此，应对“中国责任论”，最为重要的是科学把握中国的国际定位，然后来确定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总量连续超法、超英、超德并将超日，但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刚刚超过 3000 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 1.5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不仅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人均三四万美元有天壤之别，就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相当逊色。就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是一个十足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基本定位。

这个定位就决定了，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一切国际责任都要同这个要务相联系，凡是有利于促进发展的国际责任，中国都应当积极地去承担；凡是不利于促进发展的责任，中国就应当回避、抵制。让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承担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减排责任，肯定会制约中国的发展，中国不能接受，而且还要理直气壮地反对。但是，中国又不能只顾自己发展，不顾全球气候变化正威胁全人类安全这一现实。所以，中国愿意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并认真按这两个文件的要求履行义务。

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拥有 13 亿人口，经济位列世界前三甲。从这几项指标看，中国又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世界性的大国。这就决定，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上负有不同于中小国家的特殊责任。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中国总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认定中国的责任时，还要考虑到，中国还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国家统一的大国，这在当今世界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必须将相当多的外交资源用于解决统一问题。而且统一问题在对外事务中很容易被其他大国用来作为制约中国的牌，甚至被一些小国当成向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此外，中国在发展和改革中面临着许多其他大国崛起过程中未曾遇到过的难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制约着中国的崛起。这也是影响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重要因素。

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最大的亚洲国家。中国的国际责任，更多地体现在维护亚洲的和平稳定和促进地区共同发展上。因此，对亚洲的事情，中国更为关注。对那些有可能影响亚洲和平稳定发展的问题，比如阿富汗战争、缅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中国在参与其中时就需要更为

谨慎，而且也不可能采取同区外大国完全一致的立场。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又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两点又决定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需要格外谨慎。正在崛起的大国在承担国家责任时，很容易被其他大国作负面的解读，“责任论”与“威胁论”往往相伴而生。社会主义大国的身份更容易遭到西方大国的敌视。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越来越失去影响力的时候，“责任论”已成为他们用来对付中国的主要武器。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国肯定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在当今世界，毕竟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不可能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0 年第二期）

县委书记要敢于 为老百姓担当

刘 森

我从政的道路还算得上顺风顺水。1985 年不到 25 岁就被组织从科员破格提拔为正科级干部，1995 年就担任了新乡市委副秘书长。2001 年在新乡市宗教局局长任上调长垣工作，担任了 11 个月的县长，8 个年头的县委书记。2007 年，我又被组织明确为副市厅级干部。

政治是大事，哪个男儿不关心政治，哪个为官从政者没有想法，哪个青年人没有理想。我青年时期也有过许许多多的政治理想，时常想，人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能来世界走一遭不容易，能生逢其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舞台不容易，能真正抛开私心杂念为老百姓干点事不容易，不在有限的生命里发点光、散点热、干出点事业，岂非憾事。我也常生出悲壮的想法，权力只是一种符号，一种手段，一种干事的工具，完全为权力而战是可悲的。利用权力影响群体，献身使命，

实现价值，改变自己不满意的现实而随时准备失去权力、作出牺牲，才是真的从政者。在我40岁时，我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担任了县委书记，有了实现抱负的舞台。9年的酸甜苦辣，我更加体味到了“选择了从政就是选择了牺牲、选择了奉献、选择了面对重重艰难勇猛地向前行”这句话的含义。

俗话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名不可虚受，利不可苟得”。我经常扪心自问，我有多大本事、多深学问、多高品质、多少贡献，组织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厚待。我是一个起点很低的人，靠着自学懂得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当了这个县委书记，作出了一些成绩，已经满足了。担任领导职务尤其担任县委书记的这些年，我始终怀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看待权力，常常担心因为自己决策的失误而亵渎了权力、贻误了工作，甚至影响了长垣的事业。我常想，以自己的德才，9年间能够或多或少地改变一下长垣人的思想，或多或少地改变一下长垣干部的作风，或多或少地改变一下长垣的对外形象，从而或多或少地改变一下长垣的面貌，也就足矣。理想总是在现实面前引路，没有理想的社会和人生都是不可思议的。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必然是有一定距离的。而只要全心全意为理想奋斗过、努力过，心也就坦然了、无憾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我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或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我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负起责任，过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

作为从政者，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时常接触关于权力、关于名声、关于政治的话题，外界也会不时传出一些有关自己进步、调动、升迁之类的议论。从2001年以来，我曾3次被同志们和组织推荐为副市级领导干部考察人选，对我本人关切的话语也始终很多。局外人观棋也许会清醒，局外人看政治却永远不明就里。于是，就猜测、就推论、就设疑，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政治大国特有的国情吧。坦率地讲，为官从政的人没有不想升迁的，但想法不能太多，欲望不能太强，当官不能太上瘾，不能把个人的发展、升迁作为志在必得的东西。组织不欠任何人。我很欣赏有位从政者说的这样几句话，他说：“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从政者应该有这样一种心态：我是一块砖，任凭组织搬，

修大厦不自满，修厕所不辛酸。”对待个人的进退去留，就要多一点群众的“他觉”，少一点当官的“自觉”，就要顺应社会和人民的选择，就要知进、知退、知荣、知辱、知天命、“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只有始终保持一种平和、平静、平淡、平常之心，当官才会简单，才会轻松，才会洒脱。

（作者为中共河南省长垣县委书记）

（摘自2010年2月2日〈与法同行网〉）

不要看空中国

托马斯·弗里德曼

上周我在香港吃早餐时看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被一篇关于詹姆士·查诺斯的头版报道吸引住了。据说他是美国其中一位最成功的做空者。他赌定安然公司是个骗局，当他的预测被证实、安然的股价跌到谷底时，他发了一笔大财。如今他警告说，中国的情况比“迪拜糟糕一千倍——甚至更糟”，他还表示正想方设法在泡沫破裂前做空中国经济。

对于卖空方，中国的市场也许充满了适合做空的泡沫，如果查诺斯能找到一种方法通过做空中国来赚钱，希望上帝会保佑他。不过，我在过去一周访问了香港和台湾，与许多在中国大陆工作和投资的人士交谈，现在我想给查诺斯两点忠告。

第一，一直以来使我受益匪浅的一个简单投资规则是：永远不要做空一个坐拥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

第二，如今我们很容易观察中国，看到它存在的巨大问题，以及它没有正确处理的事情。例如，低利率、宽松的信贷政策、被低估的汇率和从国外流入的热钱，它们导致了中国政府在上周日所称的“过度飙升的房价”，或有些人称之为非常适合做空的投机泡沫。不过，在过去几天里，中国央行已开始小幅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此举正是为了抑制通胀和挤压资产泡沫。

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不愿意唱空中国，并不

是因为我认为它没有问题，或不存在贪污和泡沫，而是因为我认为虽然它肯定存在这些问题，而且其中一些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爆发出来（最危险的是污染问题），但中国同时也有一个政治阶层集中力量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他们有大量积蓄支持他们的工作（不像我们）。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开始，中国在过去20年所作的长线投资到现在才刚刚收获回报，而且这些投资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踏入21世纪知识时代。10年前，中国有许多桥梁和公路一味伸展，却没有目的地。现在呢，许多已经连在一起。还有，各大城市正在实施建设地铁的紧急计划，而且城市之间有高速铁路相连。再者，中国现在有4亿互联网用户，其中两亿网民使用宽带接入。入住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旅馆，你都能用宽带上网。而美国大约有8000万宽带用户。

现在，把所有基础设施建设与2700万名专科院校和大学学生（数量居世界首位）加在一起看看。只需正常分配这些脑袋，就会为市场带来大量的脑力资源，或者如比尔·盖茨曾经对我说的：“在中国，即便你是百万挑一的精英，也会有1300个势均力敌的竞争者。”

同样重要的是，现在越来越多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中国学生回国工作和创业。我与一群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共进午餐时，他们告诉我今年将会为约50名科技专业的研究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而美国主要的大学正大幅削减这方面的开支。

中国的制造业和金融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寻找能干的中层管理人员。不过人才回流正在消除这一问题。

最后，就如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向我指出的：当台湾从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到增值业务的高端时，台湾的工厂就转移到中国大陆或越南。台湾失去了它们。在中国大陆，低端制造业从中国的沿海城市转移到不发达的西部地区，而且这些产业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台湾，工厂兴建了又离开了，而在大陆，它们从东部转移到西部。

刘兆玄说：“中国知道自已的问题，但这是它第一次有机会去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台湾企业家已经在大陆开了70000多家工厂，他们熟悉那地方。因此我问了几位台湾企业家是否“看空”中国。他

们大力摇头，就好像我问他们要不要和勒布朗·詹姆斯单挑篮球一样。

等等，当时人们也是这么说安然的啊！不过，我更愿意看空欧元。现在看空中国？查诺斯，祝你好运。到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们结果如何。

（摘自2010年2月4日《社会科学报》编译为梁立峰）

撤驻京办，不如从根本上规范权力运行

未多

据新华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根据意见规定，县、县级市、旗、市辖区人民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等将面临撤销。

有人把驻京办称为“蛀金办”。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腐败案件，更有驻京办官员卷入其中。如李真案中的河北省驻京办原主任王福友因犯贪污、挪用公款、受贿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沈阳“慕马案”中的沈阳驻京办原主任崔力因贪污公款被惩处。因此，当撤销驻京办真的要变成现实时，人们不禁是称好的。然而，在被称好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开始出现：撤消驻京办一些问题就能解决了吗？

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任审计长李金华曾这样评价驻京办，他说有些驻京办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跑部”打探消息，看哪里有钱和项目，然后写报告、找关系。他指出，“这里有一个规范管理的问题，一些部委个别人决策决定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这句话揭露了驻京办“跑部钱进”的实质。各级政府为何要在北京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因为这里有土地爷、财神爷……佛爷们手眼通天，掌管着资金、项目，决定着官职的升迁。同样的项目、资金，给谁都行，那就看谁跑的快、跑的勤、跑的力度大。没有驻京办，谁都不认识，怎么去跑？驻京办正发

挥着这样的重要的纽带作用：为地方领导见到并供奉“佛爷”找关系、铺路子。说白了，“跑步钱进”的根子不在驻京办，如果佛爷还在那儿摆着，撤消的驻京办还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一个在驻京办主任位置上待了多年的“老主任”称，撤了政府的驻京办，还可以在企业设立驻京办，到时候，更是无法监管。所以说，光拆了庙是不够的，还得管佛爷，管住了佛爷就管到根子上了。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称，“要从根本上解决驻京办的种种问题，需要规范权力的运行”。如何规范权力的运行？首先，要加强监管和审计力度。一些部委在项目、资金审批上随意性太大，几千万元上亿元的项目想给谁就能给谁、想给多少就能给多少，缺乏统筹力度，也缺少必要的调查和研究。而监督和审计部门就要关注这些，要求其就项目的审批给一个合理的“说法”。其二，越是管钱管项目的部门，越是要提高政务公开的透明度，项目、资金批到哪里、批了多少、为什么批、效果怎样，应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摘自2010年2月8日《中国审计报》）

对盐业改革的 三点隐忧

雷泓霁

警惕不要让市场化沦为“商业化怪胎”。市场化的本质是竞争，是激活市场活力，提高品质，提升质量，让老百姓享受到物美价廉的生活消费品。可看看我们的诸多改革，借助改革的旗号，价格却不断上涨，水改革、煤气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以及住房改革，都是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改革，都应该具有公益性和反哺性，可最后形成的结果都是价格不断上涨，沦为“商业化怪胎”。而且这种上涨竟然经过了群众的听证，是不折不扣的“被涨价”。如果今天的盐业改革也掉到这个惯性思维中，群众的吃盐钱增加了，我们宁肯

不要这样的改革。“价格是检验改革的惟一标准”，老百姓最相信这句实话，远比那些深奥的市场化理论更动听、实用。

警惕不要让“李鬼”顶替李逵，败坏了盐市场的安全纯净。这些年来，食品行业屡屡爆出冷门，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食品、敌敌畏火腿等，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畏惧情绪已达到了胆战心惊的地步，失去了起码的期待和信任，可食用盐安全问题，却一直没有出现过重大的食品危机。当然，个别盐贩子贩卖工业盐的情况是有的。食用盐市场整体是安全、稳定的，老百姓是放心的，虽然价格有点贵。

如果放开盐业市场，在监管存在漏洞的情况下，那些不法分子肯定会将工业用盐当成食盐来卖，因为目前，全国盐厂多达近4000家，但拿到食盐生产许可证的只有96家，很多盐厂都经营困难。据报道，2004年，广东省就撤销了食盐专卖局。然而，仅过两年又恢复了这一机构。究其原因，主要是专卖局撤销后市场加碘食盐合格率直线下降。专业人士担心的“一旦食盐专卖取消，企业很可能为了减少生产成本而让工业盐流进老百姓的盐罐子”不是没有道理。如何既能放开市场竞争，又能保证食用盐的品质安全，这是有关部门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

警惕盐业市场被外资垄断。放开市场了，老外也可以竞争，可是，如果我们的民族企业不争气，盐业市场完全成了外资的天下，那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盐这种生活消费品，更是重要的营养物质。如果我们吃盐都要看外资的脸色行事，那对民族企业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这种担心绝非空穴来风，比如在食用油方面，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中国人现在连吃油都要看华尔街脸色”，“它看你个不顺眼就抬高价格，你就得多付钱。你能不能想象连吃的油都要受人家控制，炒个荷包蛋都不容易，这年头，日子怎么过？”“世界四大粮商进场收购了我国70%以上的停工企业，从此中国的大豆市场受制于四大粮商”，“你以为它们收购金龙鱼就是为了赚你买金龙鱼的钱吗？我告诉你，你太小看它了。各位知不知道跟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炒家关系密切的ABCD在做什么？它们在做全球产业链的整合”。因此，希望在盐业放开中，有关部门能够扶持好我们的民族企业，做好盐业企业的民族化。

（摘自2010年1月18日《中国审计报》）

海地：多难未兴邦

魏红霞

上帝不眷顾

如果说，这个地球上有什么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海地就是其中的一个。

海地不仅被上帝遗忘，多数情况下也被世人遗忘。而当世人关注它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国家发生令人恐惧的灾难的时候。包括2004年9月造成3000多人丧生的飓风“珍妮”的袭击；2007年10月热带风暴“诺埃尔”的袭击；2008年8月~9月热带风暴“费伊”和“汉娜”以及飓风“古斯塔夫”和“艾克”的接连袭击，这一系列的袭击让近100万人失去家园；还包括2009年3月全国范围内接连遭受的暴雨侵袭，超过1980户家庭受到影响，5000余座民房和公共建筑遭毁坏。

再有，就是这次自1770年以来最强烈的地震。

当太子港受到地震重创的消息传来之后，很多知道“海地”这个中美洲小国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词——“危机”。多年来，“危机”这个词已经与海地这个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次危机就是上天制造的。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因地处海岛而被赋予“海上明珠”之类的美好称呼，但海地却不受自然的青睐。这个国家地处加勒比海北部，与多米尼加共和国一西一东分享一个岛屿。“海地”是印第安语，意为“多山的地方”。地形复杂，海岸线曲折，但这个国家并没有因此得到富饶的自然资源，甚至没有一条可以通航的河流。多山导致气候多样，临海使其常常面临飓风的肆虐。过度伐木也导致

境内植被都是次生植物，气候复杂，常有洪水、山崩袭击。

在自然灾害中，飓风是海地人民面临的巨大威胁。飓风来临的季节，农民的牲畜和庄稼被毁于一旦；城市供水系统遭到破坏；很多人失去了家园，甚至有人因为粮食和供水不足而失去生命。

比自然条件更恶劣的是贫穷。海地人口大约900万，是拉丁美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该地区最贫穷落后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2008年其人均年收入仅为560美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上，海地位列179个国家中的第148位。与其人口极不相称。由于条件的恶劣，许多海地人选择移民美国或者其他邻国。在其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就有很多海地人生活在那里。

政变、独裁、动荡和外部干涉

除了天灾，还有人祸。

其实，海地人从来不缺少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海地建国的经历，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海地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宣布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海地的原住民是美洲印第安人，被哥伦布“发现”后，先后沦为西班牙和法国殖民地。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大量黑人奴隶，黑人与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人称作克里奥尔人。白人人口数量少的原因是，在独立战争及随后的内战时期，他们都逃亡到了美国等其他西半球国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也传到殖民地海地黑奴心中，次年他们即掀起反法独立战争，艰苦奋斗的结果是1804年1月1日宣告独立，定国名为海地。海

地独立斗争掀开了19世纪上半期波澜壮阔的拉美独立斗争的序幕，这场斗争是继美国独立战争后对欧洲殖民体系的又一次颠覆。

但是，独立之后，从殖民者那里获得了自由的人们并没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国家机制，而是陷入了内战。乱局频仍、独裁统治和外国入侵使这个国家的人民饱受“人祸”灾难。在其独立的第一个100年间，这个国家大约产生了90多个统治者，可见其政局之乱。1915~1934年的20年间，美国武装占领着这个国家，实际上使海地重新处于一种被“殖民”状态。之后即便美国武装力量撤出，由于仍是各种亲美的政权在美国的扶持下更迭，带给人民的依旧是动荡不安的困扰。

1957~1986年的30年间，海地处在杜瓦利埃家族父子两代独裁统治下。当时虽然政权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人民并没有过上稳定的生活，而是惨遭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杜瓦利埃父子带给这个国家的是“高压政治”、“骗局政治”和“盗窃政治”。为了防止军队政变的历史重演，老杜瓦利埃建立了被称为“蒙面人”的秘密警察组织，实行高压的特务政治。

1986年2月的人民起义，与同时期菲律宾、韩国、智利、南非等国的民主运动一道，构成了当时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但是海地并没有因此改变面貌。小杜瓦利埃政权被起义推翻，海地似乎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然而残余旧势力的破坏，群众的愚昧与不满，以及难以消除的军队牵制，在至今的20多年间，海地人民始终没有逃离“内患”的灾难困扰。

是不是“失败”国家

在海地独立后的前一百年里，法国和德国曾经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1915年，在一次政变使海地陷入无政府状态后，美国的武装力量占领了这个国家。美国占领期间，监督海地参议院，以美国宪法为蓝本，制订了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四年，参众两院议员任期为六年和两年，赋

予年满21岁的公民选举权。此后八年中，海地的本国工业获得扶植，经济获得改善。此外，美国还建设了公共卫生机构、公路、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公立学校；并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地方警察部队，以代替秘密警察。但是，美国的这些措施使得海地的武装力量和经济命脉例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海关都被置于美国的监管和控制之下。这让具有反抗精神的海地人很反感。反对美国驻军的活动不断，美军的生命安全甚至受到很大威胁。

193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为摆脱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而实行新政，与此相对应对拉美实施睦邻政策，美军因此撤出海地，但仍然支持亲美的海地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冷战期间，海地在国际上紧紧追随美国。老杜瓦利埃上台后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而打起“反共”旗号。但美国的援助被老杜瓦利埃及其官员贪污，导致两国关系冷淡多年。但杜瓦利埃父子政权交接期间，美国仍调动了军舰开赴两国水域之间，防止流亡者回国发难推翻小杜瓦利埃。这与美国对待古巴流亡者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对海地的干涉一直被看做是美国向海外输出民主的“试验”。但美国试验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海地历史上独裁者频出，造成国家动荡，海地难民大批涌入美国还给美国带来了许多难题，但是美国并没有将这个国家归入其所谓的“失败”国家。究其原因，除了海地重要的海上地理位置外，还因为海地的统治者大多亲美。

透过地震带来的危情，我们看到了海地人民两百多年来因天灾人祸而遭受的灾难。大自然以其巨大的力量摧毁了这个国家，或许海地人民在危难中将迎来新的生机。希望国际社会支持的重建给这个国家以真的新生。自然灾害的威胁无法避免，但是希望这次天灾能够使海地人民结束“人祸”的灾难。

（摘自《世界知识》2010年第3期）

我是怎样研究政党的

王长江

政党活动是有普遍规律的，完全可以以这种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来构建一套研究政党的理论体系

写一本专论政党的书的想法，大约萌生在20年前。1985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忽一日，系办公室要我去接待一个用人单位。我欣然答应，和中央党校的两位老师见了面。不成想，这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来人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研究党的建设，光研究中国党自己不行，还需要研究其他共产党，特别是苏共为代表的执政的共产党。当时，我们党已经恢复了与各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在这些党内，开始出现改革的呼声。和这种国际背景相联系，研究者想把国外执政的共产党也纳入自己的视野，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一构想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在想，是啊，世界上存在那么多政党，而且不光是共产党，它们也要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不可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从政党活动普遍规律的制高点，反过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便在我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最终确定了我走政党政治和政党比较研究之路的决心。

大约过了三四年，稍微进入了一点研究者的角色，对政党问题的看法也随之日益清晰起来。我坚信，政党活动是有普遍规律的。完全可以以这种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来构建一套研究政党的理论体系。世界上已经有不少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国外、海外学者搞政党研究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往往把眼界局限于西方类型的党。在他们眼里，只有西方类型的政党才是本来意义的政党，苏共、中共这样的政

党均属特例，甚至不能算作是政党。诚然，后来也有不少学者有意跳出这个框框，客观上却始终难以摆脱把西方政党作为坐标的窠臼。因此，虽然作为研究成果，已经出现了不少论政党的专著，有些专著迄今为止仍堪称经典，这些著作概括的却只是西方政党的活动规律，而不是所有政党的普遍性的活动规律。毫无疑问，只有不带偏见地、把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才能对政党活动及其规律有全面系统的把握。应当有一部这样的书，这部书就叫《政党论》。

政党研究属于政治社会学的范畴，这一定是《政党论》整体设计的出发点

说政党活动有规律性，指的是政党政治中不以单个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政党活动背后起作用的逻辑。我们时常能感受到这种逻辑的力量。在一些国家，政党被放在顶礼膜拜的位置，但事实上，政党却和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不但未能很好地履行功能，还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在另一些国家，政党被看作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肮脏场所，是政治阴谋、政治权术的代名词。背着这样的道德包袱，政党却依然能够熟练地运用政治技术，把民众调动起来，让他们怀着像观看奥林匹克比赛一样高昂的兴趣和热情，来观看政党之间的竞争。政党政治中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及其背后冥冥中起作用的东西，正是政党学要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政党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它是政治组织，是人们用来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第二，它是社会组织，是人们

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众多方式中的一个特殊品种。简言之，政党既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如果我们把政党放到现代社会的架构中，或许这个问题更容易理解一些：公共权力（也即国家或政府）和公民社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两大要素。这两大要素之间的互动，推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党就是促进这种互动的一种最主要形式。因此，政党研究属于政治社会学的范畴。对政党的这一定位，是《政党论》整体设计的出发点。沿着这个思路，全书由三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我们将分析政党这种现象的基本点，故以“政党本论”冠之。从第二部分开始，我们把政党放回它实际活动的环境中，考察它与政治社会各要素互动的情况。在第三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扩大范围，把政党放到整个政治系统中去，探讨政党和国家、社会中的诸多元素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党的建设研究不是完整的学术意义上的政党或政党政治研究

在我国，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没有确立政治学这门学科。其中专门研究政党的政党学，自然也是不存在的。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学科得以恢复，但专门的政党研究仍然缺乏。在研究内容上，和政党学比较靠近的，也就是“党的建设”了。相比之下，这倒是一个我们一直投入很大精力的研究方向。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党的建设就随着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一起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后来成为党的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党内教育的重要内容。

但是，很显然，传统的党的建设研究不是完整的学术意义上的政党或政党政治研究。首先，党的建设中的“党”，特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在学科分类上，我们长期把“党建”归入“中共党史”门下，就是一个例证。对政党自身的活动进行研究，对于政党科学地开展活动、少走弯路，实现既定目标，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它也有明显的缺陷：由于研究范围所限，这种研究

只能停留在经验总结上，难以把政党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和客观规律来认识。

其次，传统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是一种工作性质的研究。我们党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把党的建设划分成若干方面，由相应部门按照这些方面分工负责，把党的建设落到实处。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为基本内容，同时吸收了过去按照党章规定的党的性质、党的目标、党的指导思想、以及党的领导这样一种顺序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党的建设研究的框架。这种研究，在实践中对推动党建工作有重要作用。我们看到，直至今日，无论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还是在中央有关文件中，布置党的建设的工作，依然用的是这个框架。毫无疑问，这种框架是落实党的建设任务的有效路径。

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研究，对于在实践中推动和落实党的建设，始终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工作研究毕竟不是理论研究，不能代替理论研究。政党研究固然由于其强烈的实践性，不能停留在纯理论研究，而应当落脚到为政党活动的科学化服务，但两者的逻辑起点却是不同的。过去我们很长时间弄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把工作对策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用工作部署和布局研究来代替理论研究，忽视了对理论的研究，忽视对政党活动规律、特别是普遍规律的研究。这是执政党建设实践时常出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到政治社会层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把政党政治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呼唤。只停留在工作对策的研究，已经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和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不相适应了。我们需要研究党建工作，但更需要把党的建设纳入政党政治的视野和范畴，落脚在研究和把握政党活动的规律上。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

（摘自《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酷(爱)读(书)的(刘)伯(承)

史金伟

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张家坝的一户农民家庭，虽自幼家境贫寒，但父母仍克勤克俭，在几个孩子中唯一送他上学读了书。1897年，刚刚五岁的刘伯承，进了本村的私塾读书。由于他聪明、勤奋，读过的《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以及《四书》、《五经》和诸子等书一般都能背诵下来，并在书上做了许多圈点和批注，学习成绩十分优异。老师对他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刻苦，记忆力强，不仅能背诵正文，连注释也能背诵，将来肯定是个可用之才。”

1912年春，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和威严的仪表被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录取，从此开始了军人的生活。由于他各门功课成绩优异，1927年11月，刘伯承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从上海到苏联，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

刘伯承以苦学勤读、强记博闻而闻名，在他攻下俄文之后便借助俄语这个工具，大量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直接阅读了列宁、斯大林的许多原著。他还大量涉猎了欧洲著名军事家的论著，广泛地接触了欧洲战争历史和西方军事思想，为他日后成为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翻译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邓小平曾在《悼伯承》中评价说：“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

开始踏上军旅生涯后，刘伯承的勤奋苦读精神仍然不减。一些同僚见他这样苦学，感到不可思议，就劝他出去散散心。他却说：“我觉得干那些事没意思，不如看书，能学点东西。”他充分利用人“散散心”的时间，大量阅读了《孙子兵法》、《六韬》、《司马法》、《李卫公问对》等中国古代兵书。一部《孙子兵法》，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几乎能一段一段地背下来。

在长期艰苦的战争年代，刘伯承抓紧战斗的间隙读书、写作和翻译，他的许多战役战术总结、军事译著，都是在坑道旁、马背上撰写和翻译的。

他常说：“对既学来的感到用之不足，对未学来的感到求之不尽。”

就拿他35岁通过俄语关来说，不仅有年龄大、四川口音重、发起音来就跑调的障碍；还有他的右眼因在战争中受伤致残，装着假眼的眼眶时常发炎肿痛，但他硬是以惊人毅力，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地学习。在俄文里，“P”这个字母的发音对初学俄文的人来说是最难的，为了练习“P”的准确发音，刘伯承从早到晚一有空就一个人站在墙角，嘴里一个劲地念“P-、P-”，一直练习到能准确发音才罢休。为了背诵单词，晚上别人熄灯就寝了，他就跑到走廊里去背。经过一番苦读，终于突破难关，实现了他“能自阅原文书籍”的夙愿，并翻译了《苏沃洛夫十项军事原则》、《合同战术》等军事著作。

（摘自2010年2月3日《党史信息报》）

征订启事

为便于读者和订户连续收藏本刊，我编辑部已将2009年度《党政干部文摘》杂志全年12期装订成册，欢迎新老读者和订户订购。另外，我编辑部还有少量2001年，2003年—2008年《党政干部文摘》合订本。每年定价60元（含装订费和邮资）。

订购方式：

从银行、邮局汇款，请在留言条中注明《党政干部文摘》2001年、2003年—2009年合订本。

开户行：北京建设银行海淀支行

账号：2613000507

户名：《党政干部文摘》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中共中央党校综合楼

邮编：100091

款到即开发票。

世博会曾震荡晚清王朝

张 伟

1910年，辛亥革命在即，清政府风雨飘摇。这当口，出版商人张元济从国外寄回了几封信，发表在报纸上。这些信的作者是一名曾参与百日维新的前翰林，刚拜访了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博会。

张元济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去西方旅行可以得到救国的启示。但7次踏进世博会会场后，他首先感到了羞愧。他的国家，人口世界第一，却只在不显眼之处有个小展馆，规模不但无法与法、德等大国相比，甚至还比不上袖珍小国摩洛哥。他那地大物博的祖国，展馆里商品匮乏，数来数去，只有漆器、刺绣等老花样，尚不如苏杭一家杂货店里种类繁多。最让张元济感到羞愧的，也许是外国游客的反应：展场冷冷清清，西方人绝少光顾、驻足，即便偶然经过，也是“指指点点、摇头蹙额，旋即转身离去”。

寄自海外的这些信件，深深刺痛了许多国人。一场世博会让人看得很清楚：这个天朝上国，在世界上已经如此羸弱！

一

若干史料表明，1851年英国兴办世博会，是为了开拓市场、展示国威。忙于修建水晶宫的英国人未必料到，他们给远在东方的中国，带来一个打量世界的契机。

已很难想象，1876年李圭初次进入世博会是何心情。在位于美国费城的会场里，这个中

国海关文员面对叫不上名字的机械和发明，在书里记下惊讶和感慨。作为第一个代表官方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里，详细描绘了蒸汽机和打字机，并忍不住在描绘的末尾加上“是可异也”的感叹。此外，他还在书里对西方“政治之善”进行探讨，介绍当地妇女地位的平等，并对国内鄙夷现代机器的心态进行反驳，强调“凡机器之可以利民者”，不应废而不用。

二

在世博会上，李圭还看到了中国幼童在美国学习的英文作业。这些幼童于1872年由“留洋事务局”选派，并资助前往美国留学。费城世博会期间，117名中国幼童在中国官员和美国教师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参观，并成为当时费城的重头新闻。

李圭在会场上问了幼童们几个问题，对于世博会的益处，有的幼童称“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这些回答“简捷有理”，让李圭盛赞西方教育的优越。

不过，让李圭欣喜的事物，在国内则引起许多惊恐。守旧者攻击称，幼童们传统文化基础薄弱，恐怕西学未精，而传统已先丢掉，即使学成回国，也“无益于国家社稷”。而奉命在美国监督幼童的官员，甚至因为幼童跟自己对话时目光直视，而感到不满。在种种非议声中，1881年，清政府裁撤了“留洋事务局”，将幼

童全部撤回国内。这次培养人才的努力草草夭折。

留洋美国的经历，到底给这些中国少年留下什么，已无从考证。但回国后，他们有的成了清华学院最早的校长，有的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也有的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理……

而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则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股世博会热潮。据维新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回忆，他曾深受这本书的鼓舞。

三

尽管每次都收到邀请，中国政府直到 1873 年才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在维也纳举办的世博会。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奉命组织此次参展。他积极征集民间商人参加展览，并利用自己的关系，与西方国家进行沟通。

中国的展品尽管只集中于茶叶、丝绸等特色展品，但参观者对此交口称赞，奥地利皇帝因为中国代表团的贡献，特地为每一个参展者颁发了勋章。中国第一次像一个大国一样受到尊重，这也许激发了清廷此后对世博会的兴趣。而作为此次世博会参展的功臣，赫德也从此牢牢把握着世博会代表团的组织者身份。在他的组织下，从 1867 年至 1905 年，中国先后参加了 29 届世界博览会，这些参展经历，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赫德曾表示：博览会一个紧接一个，“引起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现状的好奇。由于中国赴会展品很受青睐，中国人不愿参加世博会的观念逐步改变了”。

四

最早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就已经发现，在电灯、电话、先进机器等展品中，清帝国的展馆所能提供给世界的，永远都是绸缎、茶叶、

瓷器等。在几届世博会期间，因为中国的展品中包括绣花鞋、刑具等物品，曾引起华侨和留学生的激烈愤慨，认为这样的展示扭曲了中国形象。

对中国人最大的刺激，也许发生在 1904 年的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中国展馆展出了一组人物雕像，有苦工、乞丐、娼妓、囚犯、鸦片鬼等，被认为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消息传回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自尊而敏感的中国人感到十分屈辱。

一方面是不断传来的西方文明资讯，另一方面则是本国落后的工业现状，这都深深刺激了有抱负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许多人开始主动前往国外参加世博会以开阔眼界，并著书立说，介绍新知。郑观应在当时风行的《盛世危言》中表示，举办世博会不但可以“兴商”，更能“立国”。而此时，工业在许多人眼中，已经成为“救国”的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发展经济、科技，进而带动教育和政治的进步。

此时，知识分子们希望的已经不只是先进的技术。有人注意到，在 1904 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曾出现过孙中山的身影。这个赞叹“此为全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的人，正探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救国道路。

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了近 10 年，内外交困之下的清朝政府开始酝酿最后一次变革。这些变化反映在它态度上。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清政府颁布了《出赛会通行简章》，开始对中国商人参加世博会进行规范。第二年，受命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被意大利的米兰世博会深深震撼，回国后立即上奏折建议学习。

这个帝国在它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放弃了对世博会、对西方文明的惊惧和排斥。

（摘自 2010 年 1 月 26 日《中国劳动保障报》）

中庸 养生的至高境界

唐智峰 贺军

2009年11月6日，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走完96年的生命历程。专家认为：谷牧一生坚持“中庸之道”是他高寿的法宝。

“中庸”是大道

谷牧一生坚守“常识”和“理性”，坚守“中庸之道”。从谷牧回忆录及怀念谷牧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相处得非常融洽；“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陈伯达、“四人帮”等人的猖狂，谷牧保持“沉默”，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表现出他的原则性；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经济特区”是“租界”的争论，谷牧与广东、福建省负责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取得这样的共识：不争辩，不解释，埋头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销原定决策，仍然照样干。有些事办起来有困难，暂时缓一缓，先办能做的事，表现出“择善而固执之”的“中庸大道”。

国学专家赵向阳认为，“中庸是大道，是大原则。”中庸是在一个复杂的时空中，在诸多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中，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遵循客观规律（天道与人道合一），作出最合适的选择。在为人处世中，既要把握永恒的原则，又要顺应变化的环境，因时、因事、因势、因地、因人制宜，力求做到恰如其分。

“中庸”讲平衡

湖北省中医院主任医师甘爱萍说，“中庸”体现了阴阳平衡的养生精髓。一个人身体达到气血阴阳平衡，才是最健康的。现代营养学强

调的平衡膳食，合理营养，吃动两平衡，同样源于“中庸”之道。营养物质不足影响健康和生长发育，但“过量”同样不利。比如膏方，女性及从事脑力劳动者，常常阴虚，可有些人却吃补阳的膏方，“阳盛则损阴”，因此越吃膏方，头发掉得越厉害，对身体越不利。还有些上班族在工作忙的时候，连续几天几夜只睡几个小时，双休日就连续补觉，结果越睡越累，这也是违反“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所致。

中庸重“忠恕”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意即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善良天性）。谷牧用一生践行着这三原则，修炼出一种“心存大道，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境界。

湖北省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余毅震认为，谷牧在为人处世中表现出的忠恕宽容，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关键。

忠恕他人亦是善待自己。何为忠？何为恕？宋代朱熹解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意即尽自己的心是忠，忠于内心的道德判断，良知所在；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跟他人换位思考，你就变得宽容了，就是恕。恕，特别强调善待自己和他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人只有内心坚定了信念，才可做到“宠辱不惊”，淡然脱俗，不为名利所扰，从而减少焦虑和压力。

（摘自2010年1月23日《中国劳动保障报》）

警惕国人再次沦为“东亚病夫”

徐光兴 黄建始

有科学数据证明，中国参加征兵体检的男性中只有50%合格，女性则只有40%合格，这很可怕。中国拿金牌多，就像国内SCI论文发表数量多一样，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科研水平就很高。袁伟民先生讲过，中国犯不着用拿金牌来证明国人体质，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去提高全民的体育素质。同样，中国犯不着仅以发表论文来证明科研能力强，而应该扎扎实实地让每个老百姓知道怎样管理好自身的健康。

新的“东亚病夫”不一定面黄肌瘦，也可以长得高高大大，但在体格、人格、心理等方面可能存在不足。提出这个概念，是希望国人能提高警惕。警惕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是关注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问题。

研究各国公共卫生发展史可以发现，公共卫生的产生就是因为现代国家的主要责任中有维护和促进国民健康的使命。健康和现代国家的生产力密切相关。后工业化时代，企业的利润离不开员工整体生产力的提高，员工整体生产力的提高又离不开员工整体健康素质的提高。可以说，健康的、创新能力强的员工是后工业化时代企业最宝贵的资产。健康和生产力管理已经在美国被科学证明有无限的生命力。我国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型，健康和生产力管理是可持续发展值得重视的选择。

相同的健康管理原则，多元的管理方法

中国人自古以来有关注健康、养生的习惯。几千年前，疾病来了，并不是皇帝在管理，老百

姓其实都带有管理好自己健康的基因。但是到今天，中国人的健康管理还只能算“小学”水平，应该逐步向中学、大学的程度提升，不能光讲养生，要强调以科学来指导，找到哪些是让我们不健康的危险因素，然后进一步评估、去除这些健康危险因素。

具体怎么做？要大家一起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做，“管好嘴、用好腿、不抽烟、不喝酒、好心态”的15字健康指南，应该因人而异，但更需要持之以恒。我个人不主张千人一面，大家照搬一种方法。就像穿鞋，不可能每个人都穿同一个码的鞋。关键是把健康管理的实质，确认、评估、去除健康危险因素的方法告诉大家。不可能指望一个答案解决大量不同的问题。

调整心态也是健康管理的一部分

健康不仅仅是躯体健康，就像我们讲疾病不仅仅是生物学因素引起的一样。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时，在宪章中指出，健康包括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的完美状态。也就是讲，健康一定包括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

培养好心态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沟通，再怎么强调沟通的重要性也不过分。很多时候，你说的话我理解不了，最后导致两人出现矛盾；第二，看问题的角度，要学会换个角度，角度一换别有洞天。

其实，积极调整心态本身就是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健康危险因素的定义是增加得病和死亡机会的因素。心理因素也是因子。怎样降低、

国人口味全球最重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饮食讲究“色香味俱全”,其中“味”是最重要的一项要求。而现在,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口味在不断发生变化——无辣不欢、老感觉菜没味儿、炒菜离不开各种酱料……其实,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感受。人们的口味都在越变越重,不断追求更咸、更鲜、更辣。

近日,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中国人的饮食状况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川菜以51.2%的投票率位居受欢迎榜之首,其他依次为东北菜、湘菜、鲁菜及粤菜。该调查还表明,用餐时通常优先考虑的诸要素中,47.8%的人选择了“口味”,比位列第二的“营养”多出16个百分点。各种口味中,喜欢“辣”的人最多,占40.5%;其次是“甜”,28.4%;然后是“咸”,17.3%。本报此前进行的一项2253人参与的调查也显示,47.28%的人每天至少吃一顿辣菜,23%的人两天吃一次,

18.78%的人一周吃一次。

半数人口味放第一

陈先生是广东人,初到北京时,吃饭成了个大问题。“到处都是辣的、咸的,想找个餐馆喝点清淡的汤都难。点个清炒油麦菜,上面都是明晃晃的油,吃一口,咸得简直难以下咽。”在北京工作不到一年的他,体重竟增加6公斤。而上海人本来是很少吃辣的,但今天上海大街小巷的火锅城星罗棋布;这几年上海还流行吃“香辣蟹”、“烤鱼”,即使自己家餐桌上,很多人现在也无辣不欢。

记者还随机采访了10位在北京生活居住多年的欧美籍人士,他们也表达了对中餐口味过重的“恐惧”。“北京最流行的川菜、湘菜我们基本不敢吃,因为太咸太辣,其他的如东北菜和一些中式快餐,又很油腻很咸。”一位在国内媒体

去除心理危险因素的干扰、威胁,就是健康管理很重要的环节。

现在心理咨询方兴未艾,但中国13亿人口照搬外国的精神治疗模式是行不通的。

将传统文化中禅修疗法引入“精神保健”

东西方文化对心理健康的观念有差异。东方是“耻”的内隐文化,以宣泄、开悟、解脱为主,重内在的醒悟、调整;西方是“罪”的外显文化,以倾诉、接触、矫治为主,重外在的技术、培训。心理医学应关注人是否幸福,考虑人如何“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活得没劲,

压力大,幸福指数不高,这就影响到健康管理。进入21世纪,人们从关心“身体健康”转向更多地关注“心理健康”。“精神保健”已成为国人自身发展的一大主题。

中国的文化中有禅学,与其说它是宗教,不如说是一种思想,一种生活的智慧,它对个体的生命和心灵极其关注。禅修疗法,不外乎是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与调心——这五大要素已经包括国内外一切健康管理的内涵。这是我们东方中国人的健康智慧,要好好总结和发扬。

(摘自2010年1月26日《文汇报》)

工作的美籍人士说，很多营养学家都诟病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太油太咸，其实中餐也存在问题。另一位受访者则表示，在京居住的外籍人士，能接受的中国菜基本只有粤菜，“味道最清淡，也很清新，没放太多的调味品掩盖食物本身的味道。”

而营养界则有种说法，外国人用“脑”吃饭，中国人用“嘴”吃饭。日本、西班牙等饮食较健康的地区，是根据营养结构决定吃什么、怎么吃，我们则根据味道决定饮食。中餐的菜品变化多端，但基本上都是围绕“口味”展开，很少考虑营养和健康。

有关调查显示，中国人的食盐、食糖、味精等调味品的日常摄入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就全球而言，中国人的口味毫无疑问是最重的。”中国烹饪协会副秘书长边疆说，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盐摄入量是6克/日，但数据显示，我国北方地区一些城市的食盐摄入量已达到人均15—16克/日，有些人甚至超过20克。在全球大力提倡健康饮食的大环境下，我们的饮食习惯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 四大原因让口味变重

一个人的口味改变是健康问题，但如果亿万国人的口味都在悄无声息的变化，就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国人的口味越来越重呢？

第一，在外就餐过于频繁。“下馆子”在30年前是盛大节日才有的口福，但对现在很多人来说，餐馆已经成了“第一食堂”。虽然省去了做饭的麻烦，但“太油腻、太咸”是很多人的感觉。

此外，销售酒水的巨大利润，也让餐馆舍不得少放油盐。英国一项调查就显示，酒水占到人们在外就餐开销的10%—50%，很多餐馆老板会要求厨师做菜多放盐，好让顾客消费更多酒

水。

第二，食材味道寡淡只能靠调味。调查显示，现在的蔬果肉类跟以前比起来淡而无味，鸡不鲜、肉不香、菜不甜，不得不靠大量的调味品来提鲜；而调味品不像天然食品一菜一味，味道不外乎甜咸酸辣，吃得多了腻了，只能靠加重口味来缓解厌倦感。

第三，压力大味觉变迟钝。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食疗营养部主任王宜告诉记者，除地域等因素，快节奏生活也在改变人们的味蕾。压力过大带来的紧张感，会让味觉变迟钝，味蕾也随之“退化”。

第四，高科技的调味品同样难逃其责。走进超市，各种增鲜剂、调味品琳琅满目。王宜认为，哪怕厨艺不高，有了这些也能做出口味不错的餐点，但这恰恰掩盖了食物本身的味道。“味道是鲜了，食物本身的美味却品尝不到了。”

◆ 口味过重带来几十种病

“重口味、轻营养”的饮食方式，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陷入生活方式病：热量过剩、营养不足。国际肥胖病大会宣布，现在世界上胖死的人比饿死的人多，其中包括中国。专家表示，口味的改变，可以给身体带来几十种疾病。吃盐过度会导致高血压、心脏病、哮喘、慢性肾病等；吃得油腻会导致脂肪肝、癌症等；吃得太甜会带来龋齿、糖尿病；吃得过辣会导致溃疡、胃食管反流……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高炳义还表示，一般厨师做菜“逢辣必咸”，为了中和干巴巴的辣味，需要增加用盐量，给身体带来双重危害。不仅如此，口味过重带来的健康问题，还可能影响妊娠期、哺乳期的母亲和胎儿，把一些疾病传给下一代；更有研究显示，人的口味也是会“遗传的”，父母口味过重，孩子也不能免受其害。

（摘自2010年2月9日《生命时报》记者江大红）

推进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意见提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脱产培训每年一般不少于110学时，省部级领导干部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

意见要求，要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在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发挥高等学校、社科研究机构以及部门和行业培训机构的作用。充分运用好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加强数字图书馆，数字出版物等网络学习教育平台建设，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信息化水平。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党组织集体学习制度，领导班子要定期务虚，保证集体学习每个季度不少于1次，提高学习质量。建立健全培训制度，科学安排岗前培训、业务培训、晋职培训、理论培训等，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参加脱产培训每年一般不少于110学时。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认真落实《2009—201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建立基层党员轮训制度。形成运用重大节庆日纪念日等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学习考核制度，把学习情况作为民主评议党员、综合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把理论素养、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形成注重学习的用人导向。建立健全学习成果转化制度，通过集体交流、媒体宣传、内参反映等多种形式，促进学习教育成果及时运用于党委和政府决策中。

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在每年1月底前向上级党委组织、宣传部门专题报送上一年度学习情况总结和本年度学习计划。

（摘自2010年2月9日《北京青年报》）

发改委报告勾勒 四大产业发展思路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1月29日发布“中国产业发展报告2009”，对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大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在2010年和更长远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进行了介绍。报告称，当前政策制定的关键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

农业：大稳定小调整

近期主要应该采取四个方面的措施：

首先，合理利用国际规则加强对农产品进口的管理，同时以出口退税、减免收费、提供低价运输工具、增加农产品促销专项经费投入等手段扶持农产品出口；其次，稳定最低收购价和临时存储双轨模式，探索实行国家按照最低收购价和市场价之间的差额直接补贴农民代替以最低收购价直接收购农产品；再次，着力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对农村经纪人队伍的管理和培训；最后，做好农业产业安全调研，加快建立国家农业安全保障体系。

工业：实施“三个战略”

今后两年工业的发展重点是实施“三个战略”。

一是装备更新引进战略。就是要通过加大对传统产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力度以及开展适应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需求的装备制造研发，带动上游原材料工业和其他制造业发展，促进工业的稳步回升和结构升级。

二是产业梯度转移战略。中国不同地区间工业化程度不同，工业发展水平存在巨大落差。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加快实施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提供新的动力。为此，东部发达地区要利用自身优势和国内外经济深度调整的时机，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西部地区应积极承接东部

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进一步夯实工业化基础。

三是产业并购重组战略。今后两年要注重依靠市场机制，消除体制性障碍，积极鼓励和推动有实力的企业以资产、资源、品牌和市场为纽带，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并购重组，改善产业组织结构，促进经济要素向优势行业、优势企业流动。

服务业：优化税收政策

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性行业和创意设计、管理咨询、品牌营销等新兴行业以及老年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的潜力行业，在一定期限内实行所得税优惠。建议针对服务业的特点，研究高新技术服务企业的认定标准，将无形资产和服务价值达到一定要求、主要应用高技术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或主要为高新技术企业服务的现代中介服务业，纳入高新技术企业的范围，享受其税收优惠政策。为鼓励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引进高端人才，提高产业层次，建议在计算生产性服务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对非股东工资按同行业前三年实际平均水平扣除；给予个人所得税抵扣优惠。对此类企业发生的非股东职工培训经费支出，按其实际发生额扣除。对鼓励发展的服务业给予土地税、房产税等税费优惠。

高技术产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

除了抓紧落实已有政策，重点帮扶有战略发展前景的企业，完善中小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以外，还应该加快修订政府采购目录，加大政府采购和财政补贴力度。其一，鼓励有条件地区的地方政府将自主创新产品纳入当地行业标准和政府采购目录，特别是在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节能减排、先进制造、海洋技术等领域通过政府采购首台（套）产品等扶持政策，促进高技术成果在当地转化。其二，鼓励各级政府和部门采购信息化产品，积极发展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平台，并加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建议由财政设立专项经费补贴公共信息化技术培训。其三，建议各地加大“汽车下乡”、“家电下乡”、清洁能源汽车装备公交系统的财政补贴力度，并做好配套服务，方便消费者购买和公交系统采购。

（摘自 2010 年 2 月 1 日《经济参考报》记者方桦）

卫生部：出台改进 公立医院服务意见

卫生部日前出台《关于改进公立医院服务管理方便群众看病就医的若干意见》，要求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改革公立医院服务管理，方便群众看病就医。

坚持推进预约诊疗服务。继续推动在公立三级医院实行预约诊疗，稳步向二级医院扩展。探索门诊和出院病人复诊实行中长期预约，有条件的地方试行门诊 24 小时挂号和预约服务。鼓励医务人员积极从事晚间门诊和节假日门诊。做好医院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及医院间的预约转诊服务。

优化门诊流程，增加便民措施。加强门诊信息公开和咨询服务，帮助患者预约诊疗和准确挂号，提高患者有效就诊率。加强急诊绿色通道管理，及时救治急危重症患者。

改革医疗收费服务管理与医保结算服务管理。改革公立医院收费服务管理，减少患者医药费用预付，方便参保患者就医。与医疗保障管理机构协作配合，探索实施总额预付、单病种付费，与预约诊疗措施相结合，识别患者医保身份，逐步实现患者先诊疗后结算。逐步推行持卡就诊实时结算，患者在定点医院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除个人应缴的部分外，其余均由医疗机构和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和各种结算制度、经办机构直接进行结算。

规范临床护理服务，实施整体护理模式。注重人文关怀，实施整体护理模式，为患者提供包括生理、心理、社会、文化及精神等多方面需求的人性化护理服务，减少并逐步取消患者家属陪护。

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服务绩效。以缩短平均住院日为切入点，优化医疗服务系统与流程。实施临床路径管理，探索单病种质量控制和单病种付费改革，推动医院提高绩效。

开展重大疾病规范化诊疗，有效减轻（下转封三）

原县处级以上干部 减刑一律开庭审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以来，宽严标准不明确问题一直较为突出。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职务犯罪、商业贿赂犯罪等9种情形犯罪要严惩，并明确对于职务犯罪要慎用缓刑、免刑；对于因恋爱婚姻、邻里纠纷、劳动纠纷等矛盾引起的犯罪要尽量从宽。该《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原处级以上干部减刑一律开庭审理

这一意见明确，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要一律开庭审理。

同时，对于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以及其他重大、有影响案件罪犯的减刑、假释，原则上也要开庭审理。书面审理的案件，拟裁定减刑、假释的，要在羁押场所公示拟减刑、假释人员名单，接受其他在押罪犯的广泛监督。

意见规定，对于重大犯罪，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对累犯减刑时，应当从严掌握；拒不交代真实身份或对减刑、假释材料弄虚作假，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不得减刑、假释。

意见还规定，对于因犯故意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致人死亡或严重残疾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的罪犯，要严格控制减刑的频度和每次减刑的幅度，要保证其相对较长的实际服刑期限，维护公平正义，确保改造效果。

被告人在案发后积极赔偿可从宽处理

记者还注意到，《意见》要求依法处理好赔偿

和量刑之间的关系，并明确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可以在量刑上从宽处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称，这不是“以钱买刑”的问题，积极赔偿体现了被告人悔罪认罪的表现和态度，也意味着被害人遭受的损害得到了一定的补偿。

·相关链接·

九类犯罪须重判

严重刑事犯罪：

严重危害国家政权和社会治安，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等；

严重暴力犯罪，包括故意杀人、爆炸、放火、绑架、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

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包括抢劫、强奸、抢夺、重大盗窃等；

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犯罪，包括组织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

经济领域和生产经营中的严重犯罪，主要是集资诈骗、操纵证券，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犯罪。

职务犯罪和严重商业贿赂犯罪：

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的严重犯罪；

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制售伪劣食品药品犯罪等所涉及的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

发生在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灾后重建、企业改制、医疗、教育等领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发生在经济、社会重点建设领域和行业的严重商业贿赂案件。

（摘自2010年2月10日《北京青年报》）

中国经济成功“保八”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35353亿元，成功实现了“保八”目标。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下降0.7%。

马建堂强调，去年中国经济成就是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取得的，极为不易。就GDP增长而言，逐季上升，四季度增长已从一季度的6.2%上升到10.7%。

人们普遍关注的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全年下降，年底出现上升。2009年CPI比上年下降0.7%。其中，城市下降0.9%，农村下降0.3%。居民消费价格去年11月份同比的涨幅由负转正，当月上涨0.6%，2009年12月同比上涨1.9%。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5.4%，去年12月份由负转正，当月上涨1.7%。CPI和PPI去年12月的环比都是增长1%。

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5891亿元，同比增7.8%。在39个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进出口也在11月份由降转升，12月份增长32.7%。

2009年中国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工业生产逐季回升。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3082万吨，连续6年增产；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

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885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比上年

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

马建堂表示，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是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继续扩大。

2010年中国的经济将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原因是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进出口将和投资、消费一起，很快呈现对我国经济正面的拉动作用。

(摘自2010年1月22日《工人日报》记者李秀玲)

世界银行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世界经济	1.7	-2.2	2.7	3.2
发达国家	0.4	-3.3	1.8	2.3
美国	0.4	-2.5	2.5	2.7
日本	-1.2	-5.4	1.3	1.8
欧元区	0.5	-3.9	1.0	1.7
发展中国家	5.6	1.2	5.2	5.8
中国	9.0	8.4	9.0	9.0
印度	6.1	6.0	7.5	8.0
巴西	5.1	0.1	3.6	3.9
俄罗斯	5.6	-8.7	3.2	3.0

(摘自2010年2月3日《经济参考报》)

(上接第55页) **患者负担**。选择常见恶性肿瘤、肾功能衰竭、小儿白血病、先心病等发病率高、疾病负担重、社会影响大的重大疾病，借鉴发达国家的肿瘤诊治经验，立足我国国情，制定符合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医疗保障和基本药物供应原则的规范化诊疗指南，开展重大疾病的规范化诊疗试点工作。探

索基于规范化诊疗的单病种支付与收费办法，控制医疗费用，有效减轻重大疾病患者医药费用负担。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逐步建立病理远程诊断和会诊系统，逐步解决县医院病理诊断问题，保障重大疾病规范化诊疗的基础质量。

(摘自2010年2月5日《卫生部网站》记者白剑峰)

吕 梁 赋

董洪运

乾坤动，吕梁生。天工镂，地貌成。横压八百余里。峥嵘突兀，叠嶂竞险。北起管涔洪涛，南绝龙门津口，东与太行并驾，西携黄河奔流。嗟夫！苍颜古风，可夺骚客之笔；人文史话，一贯百代风流。割其腰，因其名，取十三县而置此邑者，越三十七年矣。丙戌孟春，余衔命而迁。背条山，弃嵯海，忝位是邑。流光如飞，两载顿逝耳。

尝闻吕梁经久困厄。抱骊龙之珠而借光于四方；怀荆山之璧反乞哀于穷途。窃以为咄咄焉。故到职伊始，探山林，谒父老，阅典籍，询有司。山高路长，何惧风雨阻隔；文计堆案，不免夜阑秉烛。

昔有歌云：“人说山西好风光……右手一指是吕梁。”览邑境，吾惊焉。千峰横空，万壑纵地。云崖雾谷，皆隐藏宝之门；长阡短陌，广通致富之路。春风一拂，陂绿花开，宛若桃花源中；天寒地冻，河锁雪飞，景应沁园之词。林壑深幽胜太行，收罗眼底不辞忙。此邑也，春秋为晋国之疆，战国乃赵君所辖。属隶频变，胡汉交融。永宁汾阳，兵家必争。吴城军渡，古多战事。雄关险隘，旷古烽火；美谈悲忆，不绝史书。

离石形胜，今之治所。汉开郡府，要冲千年。翔凤飞龙，猛虎雄踞；三川汇流，折入大河。道观直出凤腰，庐阁各抱地势。郭西有池，泉出短岗。小桥卧波，莲开清流。东岩禅钟，声先白马。玄中古刹，净土一门。丹霞飞涌安国寺，北溟六载读书楼。云梦奇异，掩鬼谷桃花；柏洼胜绝，留傅山仙踪。

三春竹叶酒，一曲鸱鸡弦。杏花村里，酒之祖坊，发端殷商，百代承传。麴之筋骨，本于精粮之魂魄；酒之神韵，源出古泉之甘冽；至清至纯，简约而能醇厚；至柔至刚，朴正而若君子。牧童一指，名播九州；万国博览，荣膺金奖。晋商闯关山，汾酒走天涯。芳香飘万里，百派景杏花。草长莺飞春欲暮，我来仍是雨纷纷。余每游酒都，至半酣乃神旷。遂举碗而邀杜牧，愿常做杏花村人。

盈邑多瑰宝，美人独杏花？红枣养颜，占尽铅华风光；核桃健脑，耄耋能辩濠梁。回粳黄米，帝京贡品。野生沙棘，海内之冠。荞麦花开，散白雪

之香；土豆新熟，烹宴宾佳肴。屈产之马，假荀息而虢灭；伞头秧歌，赖传唱而流行。龙形铜觥，稀世珍宝；汉画像石，幽冥寄托。煤海滚滚，隐于地腹之中；铅铁浩浩，被覆黄垆之下。金钨钾锰，闺中待字；铜陶铅锌，深藏思贾。荆棘岂能没驼铃，锦绣必可焕金瓯。

古人云：“十步之泽，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刘渊奋起，汉国建于离石；狄青勇猛，西夏披靡边陲。武曌心雄，终成女帝伟业。天下廉吏，于成龙堪称第一；世上直臣，孙家淦满朝无双。诗坛应识宋之问，武后曾为夺锦袍。高迹可追，清风继后。辛亥革命，刘少白掷笔从戎；五四运动，贺昌君振臂投身。烽火岁月，圣土喋血。铁甲十万，战旗猎猎。红军东征，旌麾指处，阎兵亻突狼奔；游击晋西，神出鬼没，顽敌闻风丧胆。蔡家崖下，蔚汾河畔，谈笑风生毛泽东；晋绥首府，延安屏藩，统兵杀寇贺元帅。黑茶山巅，四八烈士共天地长存；三交镇前，志丹英灵与日月同辉。胡兰何忠烈，敢藐断头铡。一部《吕梁英雄传》，多少晋绥子弟血。青峰无语埋忠骨，金戈戎马换新天。

有客自京城来，访余曰：“良庖解牛，游刃有余。居官治邑，公其何为？”对曰：“立产业，构民生之根基；兴教育，造振邑之英才；开门户，徕天下之要素。铁路飞架，苍龙舞长空；公路迴峰，猛蛟起大渊。建机场，辟云衢于青霄；通航线，翱银鹏于九天；畅物流，谋货殖于万国。公明廉威牢记，允执厥中不忘。尔后可也。”客紧询之曰：“至要者何也？”答曰：“选贤任能。贤能任，邑兴可期；庸鄙专，政衰不远。”客扶座而起曰：“今之吕梁，何弊为甚？”曰：“富家一席宴，穷人十年粮。和谐共富，路途迢迢矣。仆出蓬门，民艰尽悉。虽年届天命，而锐意风雷。为政虽居一邑，兴衰牵于一国。敢不诚竭驽钝，以七尺微命，效之三百五十五万人民乎？方今吕梁，百业正举，上下同心，共谋发展。励精图治，争雄三晋不远；开拓奋进，笑傲神州有期。”

（作者曾任吕梁市市长。收录时有删节）